

## 由孔廟淵源談徐宗幹對魯臺二地之 文教貢獻

黃啟書\*

### 摘 要

大凡考察一地孔廟，除可比較建築規制外，對於所保存的祭祀儀典、禮樂器物，以及相關文史人物，都應詳盡記錄其異同。臺南孔廟今存有道光28年（1848）分巡臺灣兵備道徐宗幹所立孔子行教圖像碑一通。民間文化人士曾追索此像與山東所存者或同出一源。但學界對此一問題，並未加探究。同一款式之孔子行教圖碑，今猶可於泰山孔子廟中考得，且該廟山門照壁上猶存徐宗幹道光12年知泰安縣事時所題對聯。

臺灣學界對於徐氏治臺宦蹟與軍事武功之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大陸則多關切徐宗幹與泰山之關連。整體而言對於徐宗幹之文教貢獻，著墨猶鮮。本文即徵考徐氏著作、方志材料與田野考察所得，以魯臺二地孔廟為核心，鉤勒其對於地方文教推動之貢獻，凡有修建學宮、崇祀先賢、課試諸生、刊傳書籍圖像數端。文中並探究徐氏所傳孔子圖像之來源與動機，蓋與其歷任魯省的地緣因素，又與孔孟聖裔建立師友關係，極力蒐羅碑刻圖像，更重視課士，崇尚教化的施政宗旨有關。

拙著撰作間，多蒙原籍山東泰安之臺大中文系名譽教授張亨先生鼓勵。先生於完稿前數月辭世，謹以此文，申表哀思。

關鍵詞：孔廟、孔子、徐宗幹、泰山、臺南

---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A Stud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Xu Zong-Gan to the Confucius Temples of Shangdong and Taiwan**

Huang Chi-Sh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Xu Zong-Gan was a competent official in the Qing Dynasty. He has served as Shandong, Sichuan, Taiwan, around the size of the officials. Because of he and the descendant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ha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he got a precious portrait of Confucius. Then he carved this portrait enthusiastically at the Confucius Temples of Shandong Taishan, Sichuan Boryeong, and Taiwan Tainan. These carved stones still be conserved in Taishan and Tainan.

Researches of Xu, almost focus on the achievements of hi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his articl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is anthology, chronicle and chorography, try to describe his contribution to culture and education,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s, worship saints, teaching and publishing, etc.

**Keywords: Confucian Temple, Confucius, Xu Zong-gan, Mount Taishan, Tainan**

# 由孔廟淵源談徐宗幹對魯臺二地之 文教貢獻

黃啟書

## 一、前言

凡考察一地孔廟，除比較建築規制外，對於所保存的祭祀儀典、禮樂器物以及相關文史人物，宜詳盡記錄異同。筆者自研究臺北孔廟入手，即注意鄰近保安宮信仰團體與執事人物對興築該地孔廟、保存祭儀等，皆卓有貢獻。在臺南考察時，留心當地猶存道光 28 年（1848），分巡臺灣兵備道徐宗幹所立至聖先師石刻像及碑記。<sup>1</sup>民間文化人士曾努力追索，以為此像實與山東所存者，同出一源。<sup>2</sup>但學界對此一問題，似不感興趣。2016 年筆者前往山東曲阜考察三孔，順道至泰山孔子廟一覽。該廟籌建於明嘉靖、萬曆之間，乃為紀念孔子登泰山之勝蹟所立。依其兩廡大小推測，當時或難有制式的從祀。歷經時代變遷與人為破壞改易，如今面貌只算一間單純祀孔的民間廟宇。然在山門照壁上，尚留存徐宗幹所刻孔子行教圖碑。兩旁有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可以語上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題款上下為：「道光壬辰（道光 12 年，1832）四月望日」「知泰安縣事江左徐宗幹敬題。」益發引起本

<sup>1</sup> 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載：該石碑為道光 28 年（1848），分巡臺灣兵備道徐宗幹重鑄自山東曲阜一幅孔子聖像，正面刻孔子任魯司寇時佩劍像，傳為唐吳道子手筆。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文化資產個案導覽·至聖先師石刻像碑記」，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web/cultureassets/Antiquity/info\\_upt.aspx?p0=8629](https://nchdb.boch.gov.tw/web/cultureassets/Antiquity/info_upt.aspx?p0=8629)（2016 年 7 月 18 日上網）。

<sup>2</sup> 山東人士楊寶生在一份資料中得知：泰山孔廟和臺南孔廟有淵源，乃發起「一像牽起兩岸情」活動，經臺灣中華日報社協助，得抵臺以 12 天時間走訪全臺 25 處孔廟。林雪娟：〈府城山東孔子像系出同門〉、〈兩岸三孔子像緣來是一家〉，《中華日報·臺南產消版》，2014 年 8 月 21 日；〈楊寶生盼牽線台孔廟訪山東孔廟〉，《中華日報·臺南產消版》，2014 年 8 月 22 日；〈山東旅人楊寶生 12 天訪 25 孔廟〉，《中華日報·臺南產消版》，2014 年 9 月 2 日。

人對於研究徐宗幹之興趣。學界對於徐氏治臺宦蹟與軍事武功之研究，已有一定成果。<sup>3</sup>但對於徐宗幹之文教貢獻，則仍鮮少著墨。<sup>4</sup>此事經向張亨先生匯報，先生多有慰勉。蓋先生籍貫山東泰安，於臺灣執教上庠數十載；一如徐宗幹曾知泰安縣事，後任臺灣道。正擬從容撰述，期報師恩之際。詎料未及數月驟傳先生逝世噩耗。今謹以此文，聊報先生當年提攜恩情，並告慰在天之靈。

徐宗幹，字樹人，江蘇通州人。嘉慶 25 年進士。參考《清史稿》、《清史列傳》所述徐宗幹仕宦履歷云：道光元年初仕於即署曲阜知縣，後除武城縣，再調泰安縣。在任十年，有政聲，遷高唐知州。在高唐知州後，道光 17 年署臨清直隸州，後遷濟寧直隸州知州。21 年則署兗州府知府。22 年擢四川保寧知府，兼署川北道。尋復擢升福建汀漳龍道，25 年丁母憂去官，服闋，起授福建臺灣道，咸豐 4 年擢按察使。後為巡撫王懿德所劾，解任。旋召來京，命赴河南幫辦剿匪。7 年授浙江按察使，遷布政使。同治元年擢福建巡撫。3 年偕閩浙總督左宗棠以次剿平粵匪李世賢、汪海洋等。5 年卒於任，享壽 71 歲，謚清惠，祀福建名宦。<sup>5</sup>《清史稿》結以閩浙總督左宗棠、將軍英桂奏疏之語：「宗幹循良著聞，居官廉惠得民，所至有聲。」《清史列傳》亦云徐氏「歷任政績，編入國史循良傳。」是固以循吏聞名。履歷中，凡於高唐州剿濰縣教匪馬剛、息汀漳龍道械鬥、平臺灣洪恭之亂，偕閩浙總督左宗棠剿平粵匪等，至於豫、皖、蘇、浙等省幫辦剿匪、辦理團練云云，總以軍功平亂為著。然徐氏自稱「家世業儒，尤精於醫。」<sup>6</sup>又〈寄連峰御史書〉載諸生拜謁徐母時稱：

<sup>3</sup> 詳參李毓嵐：《徐宗幹在臺施政之研究（1848-1854）》（桃園：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7）。

<sup>4</sup> 如楊永智：《明清臺南刻書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 106-113，亦提及今人疏忽徐氏之文治，故特留意其活用刻書一術，藉以推動科舉文風、政治教化、社會教育等施政。該論文遂列舉考述 23 種徐氏刻書的版本著錄與序跋記載。惟楊氏論文亦只留心刻書，至於其他，則付之闕如。遑論徐氏於其他地區的政績。

<sup>5</sup>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卷 426，頁 12248-12249；不著撰人，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49，頁 3891-3896；年歲參考清·徐宗幹編：《斯末信齋主人自訂年譜》，收入郭秋顯、賴麗娟主編：《清代宦臺人文文獻選編》（新北：龍文出版社，2012），頁 17，徐宗幹〈遺摺〉自述。以下所引《斯末信齋主人自訂年譜》，多簡稱《年譜》，且為避註腳繁出，以下逕於句末標明頁碼，以便讀者覆查。

<sup>6</sup> 清·徐宗幹：《斯末信齋文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59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雜錄〉，卷 3，頁 18。以下所引《斯末信齋文編》文句，悉出此版本。

老母慈訓云：「汝等之官長，尚不改書生本色。不善作官而善課徒。汝等勉之。」諸生諾且笑。此近日愉快之事，可以告知己者也。（〈官牘〉，卷2，頁27。）

江左鄉區之士出身而投身吏事、團練，蓋以國勢日衰，動亂頻仍之故。《文編》記其治民理念云：

士民呼州縣曰父母，呼府道曰公祖。府道教屬吏如子弟，方能視百姓如曾元。父之教子也，當寬嚴並濟；祖之撫孫也，則一於寬。毋依勢作威，倚法以削。為府道者，當書座右。

州縣之於民，父之於子也。當督之以嚴。太嚴，偶濟之以寬。道府之於民，祖之於孫也。當撫之以寬。太寬，偶示以嚴。（〈語錄〉，卷1，頁6、8。）

其志固不在討逆平亂；刷新吏治、安民定邦，方才是徐宗幹念茲在茲者。

今如欲考察徐宗幹生平與言論，自當以《斯未信齋主人自訂年譜》、《斯未信齋文編》為準。其子徐毓海《年譜》跋云：

先大夫手訂《年譜》一卷。始於嘉慶丙辰（元年，1796）十月，訖於同治丙寅（5年，1866）六月。維時有大星實，遂絕筆於此矣。（《年譜》，頁187。）

同治5年9月徐宗幹患腹疾，10月棄世。因此徐氏生平事蹟，乃至國史館編纂採擇，多本其手訂年譜。至於《文編》，徐氏咸豐5年（1855）自序云：

閒居檢書課子，行篋中有奏稿六卷，多在官時，廢寢忘餐而為之者，是皆一縷心血之所存也。爰選錄若干篇，藏於家。如以擬入告之謨猷，則吾豈敢？（〈序〉，頁2。）

該書〈雜錄〉更云：

《斯未信齋全錄》三十餘年心血所聚也。執掌道途，必攜挈不離左右。……錦繡珠玉不足惜，惟筆墨精力所存心焉。繫之隨帶萬餘里矣。乃竟片紙未失，喜且欲狂。宦游二十餘年，無長物，所積蓄者此耳。（〈雜錄〉，卷5，頁24。）

此段記錄了徐宗幹將文稿攜入篋中運至成都，因歷宦諸處再輾轉運到淮揚。其間或

---

為避註腳繁出，以下逕於句末標明篇卷與頁碼，以便讀者覆查。

因其沈重用以壓車輾以求穩；甚至為盜所攫，見棄諸河而復得。又提及全集「數百卷皆以臺產雞皮紙為面底，削樟木為夾板，分冊繫之以帶。以樟能辟蠹，故年久無殘損。」足見其對於著錄文章之珍惜。今本凡有〈奏疏〉2卷、〈官牘〉7卷、〈軍書〉4卷、〈藝文〉4卷、〈語錄〉3卷、〈雜錄〉6卷，共26卷。另再與《斯未信齋詩錄》16卷合刻。由百餘卷而成40餘卷，其云：

咸豐癸丑，臺陽寇警，僕人以書筍窟地藏之。憇其半生心血，化為劫灰也。逾三月，全臺平。鄉人王禮堂發其覆，皆成泥沙，為白螻食者過半矣，檢存什之四五。殘篇斷簡攜返榕城，於乎宦游三十餘年，存者僅此耳。道路萑符之患，風濤戎馬之驚，尚不至即與草木同腐，又幸之幸者也。（〈雜錄〉，卷5，頁24。）

考諸《年譜》，同治2年8月「刊《斯未信齋文編》」，小注云「官牘、軍書、藝文、語錄、雜錄各集。」（《年譜》，頁167。）則自咸豐初定後，至同治年間方正式刊行，是亦出於徐宗幹手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及郭秋顯、賴麗娟主編《清代宦臺文人文獻選編》皆同一底本，惟二套叢書編者於題記多依序云為咸豐5年刊本，實則官牘、軍書、藝文等編中多有出於咸豐5年以後文字。又有丁曰健所編《治臺必告錄》者，其〈序〉云：

道光二十七、八年間，曰健任臺灣廳縣時，中丞徐樹人大人觀察臺澎六年之久，常得謁見。於平定分類及樹旗各逆案，疊次保獎，以得民心為可恃；凡所以治臺者，無不指授多方，俾得庶事就理。

中丞復保奏平臺，奉旨補授臺澎兵備道，加按察使司銜，提督學政，並統辦軍務，懼弗克勝。瀕行辭公，公以《治臺必告錄》一書見授；謂治臺方略，全在因地制宜，名賢往事可師。

此書乃公在臺數年參酌搜討，薈萃諸名臣之精華而加以偉論；大意重在知人安民，匪特健之奉以周旋，凡有治臺之責者無不當引為矩矱也。爰即校正付梓，以傳公諄諄求治之法。<sup>7</sup>

是該書雖經丁曰健附其在臺所上奏摺與及自著《平臺藥言》而成，實則奠基於徐宗

<sup>7</sup> 清·丁曰健：《治臺必告錄》（清同治丁卯知足知止園刊本，1867），〈序〉，頁2-4。

幹之蒐羅。該書卷 4、卷 5 專載徐氏言論，可與《斯未信齋文編》互參。至於地方志部分，明清官吏於到任之際多留心方志之編纂，但徐宗幹則因其蒞任較短而未及修撰<sup>8</sup>；或因官階較微而未與修撰；或修而未存<sup>9</sup>；因此綜山東、四川、臺灣、福建四地，惟濟寧直隸州、高唐州等方志較見徐宗幹之紀錄。故研究時，仍以徐氏手訂之《斯未信齋文編》最為主要。

## 二、徐宗幹仕宦之文教貢獻

徐宗幹歷任山東曲阜、武城、泰安等縣知縣、高唐州知州、臨清直隸州、濟寧直隸州等知州、兗州府知府；四川保寧知府，兼署川北道；福建汀漳龍道、臺灣道；浙江按察使、布政使；福建巡撫。主要仕宦地點為山東、四川、福建、臺灣及浙江。福建、臺灣二地多以剿叛綏靖為主要宦蹟；在山東諸州縣，則多見文教施政。但仕宦各地時或多或少受其早年治理地方的影響，比如修建學宮、崇祀先賢、課試諸生、刊傳書籍圖像等。諸事項環環相扣，以下謹分別由學宮修繕、課士與刊書等數項，舉例明之。

### （一）修繕學宮、崇祀諸賢

徐宗幹所監修之《濟寧直隸州志》，對廟學即云：

<sup>8</sup> 參考《斯未信齋主人自訂年譜》所載：徐宗幹在曲阜任上惟 4 月、武城 1 年餘、泰安 8 年、高唐州 4 年、臨清直隸州 1 年、濟寧直隸州 3 年、兗州府 7 月、四川保寧府 8 月、福建汀漳龍道 8 月、臺灣道 6 年餘、浙江按察使 4 年餘、福建巡撫 5 年。惟泰安、高唐、臺灣道與福建巡撫等任期較長。

<sup>9</sup> 如清·徐宗幹：《斯未信齋主人自訂年譜》，頁 42、49 所載：徐宗幹於道光 10 年泰安任內「修《泰安志》」，15 年高唐任內「創修《高唐州志》」，但今未見二方志。又如清·徐宗幹等：《（道光）濟寧直隸州志》，收入《中國方志庫》初集（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0），盧朝安〈敘〉，頁 1-2 云：「道光戊戌徐樹人先生牧濟甯時撰著《州志》，未及槩而行。越十餘年，朝安來牧斯州，求其藁於架閣，則泥爛塵封，幾供蟬鼠矣。幸字畫損佚尚少，公餘讀之，較乾隆中彙脩之志，擷華汰繚、補漏拾遺，固已遠勝。」盧氏乃集徐任之後十九年之事，以為續志刊刻，謙云「朝安不敏，其治事遠不及徐公；於公之述作何能為役。」蓋修志之作「豈特紓舊令尹之懷，亦以完新令尹之責也。」

唐開元以後，郡邑通有孔子廟，而廟與學未合為一。宋初凡州邑皆立廟，士不滿百人者，猶不得立學。慶歷以後，乃遍天下。自明以來，一州一邑，無不立學矣。其鄉里社學，猶黨庠里塾之遺也。<sup>10</sup>

徐宗幹雖然曾任職曲阜，但時日甚短。而且曲阜孔廟修繕，小則由衍聖公府即行，大則由中央派員營辦，因此在曲阜並未留下徐宗幹的紀錄。不過就《年譜》所述：徐氏於道光 20 年濟寧直隸州任上倡修城垣並新學宮，咸豐 9 年浙江布政使任上亦修繕杭州府學。（《年譜》，頁 56、150。）又道光 17 年高唐州卸任後，自述政績亦言：「倡修學宮，舊有鐘樓，改建奎光閣。」（《年譜》，頁 53。）周家齊《（光緒）高唐州志》〈學校考〉載此事於道光 15 年。<sup>11</sup>《文編》收錄〈重修高唐學宮記〉詳述其事：

昔韓文公謂：修孔子廟為為政之先務。政亦多術，豈唯繕牆垣。雖楹桷塗丹雘，遂以砥厲風化，匡失俗、易民視乎。蓋相求於其本也。從來言吏治者，不外農桑、學校。乃或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徒講求於科條法令之間，謂蚩蚩者難與為善。而野處之秀，有造之才。一任其暴棄而奮興無由，子衿佻達，父兄之教不先歟？長民者之惡歟？且夫醫者祀先醫，牧者祀先牧。醵錢立廟，祈報惟誠。或賽神拜佛，顛愚無知，謂其能降祥也，不忘本也。黨庠家塾之不聞，而淫祠殆遍。謁金絲之堂，履俎豆之地，塵封草茂，邑之士大夫豈忽然置之莫為之倡，相忍安之而已。况乎美備之規創難而因易。前人不畏其難，而後人或憚其易舉也廢也。司牧者為之也。（〈藝文〉，卷 1，頁 2-4。）

文中所稱韓文公語，蓋櫛括韓愈〈處州孔子廟碑〉中讚歎處州刺史李繁修處州孔子廟之卓識。<sup>12</sup>徐氏力陳治民之本當在衣食與教化；而不在申嚴法令。但民間風俗但

<sup>10</sup> 清·徐宗幹等：《（道光）濟寧直隸州志》，卷 5 之 1，頁 1-2。

<sup>11</sup> 參見清·周家齊等：《（光緒）高唐州志》，收入《中國方志庫》初集（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0），卷 3 之 2，〈學校考〉，頁 2-3。

<sup>12</sup> 唐·韓愈著，宋·朱熹校：《朱文公校昌黎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 31，頁 3-4 云：「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為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

知賽神拜佛，以致淫祠遍佈。相形之下，學宮家塾卻塵封草茂，此正官守者所當匡正者。因此，其將學宮地基繚垣為界，並以次修舉明倫堂及鄉賢、名宦諸祠，並創建文昌三代祠。徐氏又有〈與高唐紳士書〉中提及昔大覺寺東，義學學田百畝，為今校場。今擬將演武場遷到城外，大覺寺瓦礫基址則移建書院、考棚。該文先提及校場在城中，當使「多麟閣之才，少鳳池之彥」，又云：

州署舊在學宮之西，鐘樓寺塔皆坐巽方。自以民宅為官廡，移近東門，位置全易。闕里孔琴南孝廉嘗言：「城上東南隅宜建添魁亭像奎星，其上承以轉圜之木，以年之支干，於立春日移其所向。甲（西北）、乙丙丁（正北）、戊（東北）、己（正東）、庚（東南）、辛（正南）、壬（西南）、癸（正西）。則科名之應如響。」（〈藝文〉，卷1，頁4-6。）

雖自云「雖形勝之說不足憑，其理未嘗謬也。」但由徐氏對於孔琴南風水之說的引述，似頗為信服。《（光緒）高唐州志》所載徐氏所撰〈新修奎光閣碑記〉，更可為證，文云：

道光癸巳予蒞茲土，展視宮牆殘缺已甚。樓在學之左，而適居城中。瓦礫傾欹，心滋怒焉。越次年，紳民請勸捐併修。夫廢者舉之，有司之責。都人士皆踴躍相從，鳩工庀材。至乙未秋，並觀厥成，因易名為奎光閣，仍懸鐘以沿其舊。……鐘樓舊有官地四十餘畝，……今撥歸鳴山書院，增益修脯。政貴由舊，而因革損益，期於可久。揆諸前賢作人之意，吾知其必有合也。且夫興賢育能，固無取堪輿家言。勞民造作，徒粉飾侈美觀也。亦豈唯是弋科名為閭里榮乎。匠翹秀以儲梁棟，上為岩廊，蓄有用之材；下以振風俗而登康乂，所維繫者鉅也。<sup>13</sup>

再次強調興賢育能不宜因堪輿風水之說，但倘有助於科名而增榮閭里，亦樂觀其成。正如《年譜》徐氏自陳其治理泰安一縣成效云：

泰自雍正甲辰後，無登甲榜者。於岱麓建文峰塔、修柳下惠祠，以孫泰山、石徂徠兩先生配祀。壬辰會試得盧琳、程燦策二人。（《年譜》，頁45-46。）

並有〈文峰塔歌〉詠之，詩序除提及泰安雍正甲辰後無登甲榜者，建塔後「登鄉薦

<sup>13</sup> 清·周家齊等：《（光緒）高唐州志》，卷3之2，〈學校考〉，頁6。《斯未信齋文編》未收錄該文。

者，比昔多且倍焉」，「豈形勢家言，固未為無憑耶，邑人繪圖徵詩，作長歌附之。」（《詩錄》，卷6，頁15-16。）咸豐9年浙江布政使任上重建文昌坊，自注亦云：

改名狀元坊。浙省殿撰題名二十餘人。後庚申狀元鍾駿聲，杭人也。（《年譜》，頁150-151。）

足見徐宗幹對於這些能裨益地方科考的風水建物，其實非常得意。

誠然，鄉邑科甲是否昌茂？並非多建幾座奎星閣、文峰塔或狀元坊就可以達到。徐宗幹除了整修學宮之外，更積極興復當地書院，籌置學田。書院的功能乃是介於官學（儒學）和私學（民間書院）之間。設使書院建立由地方官吏倡議，書院山長亦由地方官員任命進士或舉人出身的文士來出任，則此類可謂是公立書院。清代亦有部分書院，是由政府、官員、地方士紳所共同捐建，經由政府批准而成立，算是官督民辦的書院。另外一種則雖由當地官員及士紳捐錢、捐地所創建，但一經批准設置後，則山長、職員以及書院的經營，概由書院自理，則視為私立的民間書院。書院教授的內容多與科舉有關，類似科舉的先修班。因此其功能與地方學宮，可謂相輔相成。徐宗幹由知縣到巡撫，都可看到其對於推動學院不遺餘力。《年譜》中即數度提及興復地方之書院。如道光元年於武城縣興復弦歌書院、15年於高唐州興復鳴山書院。（《年譜》，頁35、49。）自述泰安治蹟則云：「復岱麓書院，購經史藏其中。……設醴泉義塾於岱麓，延師教弟子，祀諸鄉先生，而以唐陶山師附之。」（《年譜》，頁45-46。）並強調朔望率弟子於義塾行釋奠禮。於濟寧則「割三官廟、僧道廟田為漁山書院膏火。」（《年譜》，頁58-59。）《文編》載〈廟地改撥書院經費議〉即云：

茲查州城東關之玉露庵、北關外之三官廟，各有僧道百餘人，廟地二三十頃。雖廟宇尚屬清靜。而以膏腴之土地，養無業之游民，殊屬無益。……前州倡捐添建漁山書院，因捐項不敷，尚未籌及經費。現已延師主講，所有生徒膏火獎賞等項，仍係捐廉支發。即再勸捐，一時難有成數，且生息無多，亦不能久應。請將玉露庵原捐地畝退回二頃，三官廟地再請酌撥八頃，共地十頃，為漁山書院膳地，招佃交租。既免勸捐之煩，又可為久遠之計。以僧道無益之虛廩，為養人材之實用。而該廟產業稍減，則入釋道之教者，不至日增。

似亦黜異端而崇正學之一道也。(《官牘》，卷1，頁20-21。)

《濟寧直隸州志》載知州徐宗幹〈增撥膳田記〉亦云：

書院何為而設也？崇正學也，端士習也，經正化之原也。豈惟是揣摩舉業、弋科名云哉。嘗是通都大邑，每多古剝叢林，金澄紺碧，縉流羽士，飽食逸居。而家塾黨庠，寒畯子弟，餬日而恐不贍。韋布之士，兀坐青氈，舌耕終光，良可慨已。士為四民之首，司牧者其能恣然置之耶！濟城舊有漁山書院，久已圯廢。後於城西添建任城書院，歸河廳經理。王中峰觀察前在州任，倡議勸捐興復。……道光己亥冬河帥飭撥道庫生息餘項二千兩發存運河廳，又籌捐銀二千兩分交濟甯、臨清兩衛典肆。均自道光二十年為始，取什一之息，師長之修脯有所出，而生徒之膏火尚未敷也。又與玉露庵僧人達典常清觀道士張永智等議：分僧庵地二百畝、道觀地八百畝，各立約劑，仍暫交僧道佃種，按年輸制錢五百貫。申明各憲立案，一切收支章程，備載碑陰。以游間無益之虛廩，作培養人材之實用，庶幾經正民興仰，副聖天子作人之雅化，而無負河帥各憲為國儲賢之至意。與有增廓而無廢墜則，所望於後之君子。<sup>14</sup>

明清以來佛寺、道觀無論由信眾的自願布施或寺院自行購得，特別是皇帝賜與以及官府撥與者，兼併了大量的田產。<sup>15</sup>尤其信眾對於修建寺廟道觀多積極主動，但對於官方募資興學，便多有推拖。從徐氏的陳述可以了解漁山書院設立，雖由官紳捐貲而成，但捐款與學田租賦，卻不足支應膏火。因此徐氏運用官方的力量，將原捐予玉露庵之地退回二頃，再由三官廟撥八頃，合計十頃，仍暫交僧道招佃，其田租則部分作為漁山書院膏火。在〈與高唐紳士書〉一文亦言：

查舊志所稱義學，今皆無考。宜一一清理，並各廟宇籌議改建，均立義學於其鄉，以廟地為贍田。俾草野不匿之秀，由鄉學而城學，由城學而入書院。又其尤者進膠庠而教之。地與人皆復古，文與武皆同科。唐城其煥然日新乎！守土之責，豈在科名。化民之原，端由學校。(《藝文》，卷1，頁5-6。)

更廣泛利用各地民間廟宇設立義塾、社學，一則拔秀士，二則敦禮教。《斯未信齋詩

<sup>14</sup> 清·徐宗幹等：《(道光)濟寧直隸州志》，卷5之1，頁21-22。《斯未信齋文編》未收錄該文。

<sup>15</sup> 參方旭峰：《明清之際浙江禪宗寺院地理分布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08)，頁34-35。

錄·岱南續集》有〈鄉塾漫題〉詩，詩序即云：

泰邑好鬼，淫祠徧鄉里。近年半為書塾。停車小憩，為之忻然。

詩云：

菩薩低眉佛歡喜，酒肉之僧飢餓死。左右金甲其嚴乎，負牆而立十日視。梵偈難解書易溫，識字舍身胡為爾。我欲藏滿香積廚，墳典索邱圖經史。無施香火出束修，童叟環立各唯唯。嗟嗟邪慝何自興，天下反經而已矣。先生弟子同和南，蓮花座前拜孔子。（〈詩錄〉，卷5，頁8-9。）

詩中深切表達對於不事生產，卻坐擁田產，接受信眾供養的僧眾不滿之意。<sup>16</sup>

除了將寺廟的廟田納為書院之用，而遷改院址為義學之用。徐氏甚至也試著改變廟宇祭祀對象，以儒家先賢為主。前述泰安任上，即「修柳下惠祠，以孫泰山、石徂徠兩先生配祀。」在岱麓所設之醴泉義塾，亦「祀諸鄉先生，而以唐陶山師附之。」<sup>17</sup>對於一些未能經中央核定從祀文廟兩廡之列的儒生，例來猶會在其本籍立祠。<sup>18</sup>因此崇祀孫復、石介二賢，至為允當。在濟寧時，除前述「割三官廟、僧道廟田為漁山書院膏火。」更「撤淫祠，改祀先賢如樊子、高子、曹子、鄭子。皆訪其後裔，請奉祀。」參考徐宗幹所修《濟寧直隸州志·人物志》，即從祀兩廡之先賢樊遲、高柴、曹卹、鄭國四人。<sup>19</sup>《州志》之所以能有如許記載，乃得力於徐宗幹所得之先賢譜牒。<sup>20</sup>即在福建任內，則討論漳郡朱子祠之配祀宜增明人陳晟先生。<sup>21</sup>

<sup>16</sup>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語錄〉，卷1，頁1云：「濟州城內尼庵甚多，積習已久。年老者，逐之無所歸。今移居城外大寺各庵，佛像埋之。愚民皆懼，因移奉他廟之寬大者。考志乘：舊有先賢祠，今久廢者，奉主其中，訪奉祀生居之。黜異端、清奸匪，一舉而數善備。」則徐氏在魯時用了較為雷厲風行的手段處理寺廟。這樣的方法，對比治臺時，則較為少見。

<sup>17</sup> 唐陶山，諱仲冕，湖南長沙人。徐宗幹乃其州試時所取之士。曾主講泰山下。詳參清·徐宗幹編：《斯未信齋主人自訂年譜》，頁26；清·徐宗幹編：《斯未信齋文編》，〈雜錄〉，卷6，頁23。

<sup>18</sup> 如王安石在宋徽宗政和3年（1113）因其婿蔡卞之故，1113年（政和3）封為舒王，與顏淵、孟子一同配享孔子，位在孟子之次。其子王雱也被追封為臨川伯亦入從祀。靖康元年（1126）楊時言王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詔降為從祀。淳祐元年（1241），理宗幸太學，詔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黜王安石。今撫州府學則列王安石在鄉賢祠中。

<sup>19</sup> 清·徐宗幹等：《（道光）濟寧直隸州志》，卷8之1，頁37-42、55-62，對於四人各有世家記載。惟諸賢未必皆魯人，如曹卹，乃蔡人。其62代孫曹承先於明正統間方遷於山東濟寧州。

<sup>20</sup>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雜錄〉，卷1，頁8-9云：「濟上得先賢譜牒甚多，樊子、任子、曹

《文編》又記載數則夢事：

夢宋犖投刺請見牧仲先生入山東名宦祠。時方修志，濟州祠內缺先生木主，因補奉之。

昔年在泰安時，夢黑衣而朱裏者。次日得鄉先達朱縉衣所著《沁心編》，因梓行。

九月十七日夢書「古柳高風」四字。時方擬復先賢陳子祠，故祠在古柳樹莊。（〈雜錄〉，卷1，頁4。）

雖儒生每雅道孔子夢周公之事，因此徐宗幹亦將先賢鄉達入夢，做為施政的啟示。今人視之固感怪誕，但由此可看徐氏對於鄉賢闡幽顯微，不遺餘力。再則，其所崇祀先賢又不一定盡為儒生。如在短暫的保寧府任上，便曾為張桓侯祠增祀張苞、張憲。《文編》載其〈張桓侯祠增墀配像記〉云：

閬中桓侯祠墓，昔日嘗序其昭穆，訪其雲初，主匕鬯而司洒掃，代遠年湮，無可稽考矣。學官萬含暉云：「成都昭烈帝廟兩廡列蜀漢諸臣將軍，並從祀其中。」茲亦援照，配食於左。嗚乎，仰世家之忠勇，其後必昌。感廬墓之悽愴，象形唯肖。歛歔憑弔，不覺忠孝之心，油然而生也。是為記。（〈藝文〉，卷2，頁18-19。）

文中主要論述張飛長子張苞。至於〈增祀烈文侯記〉則述張憲：

宋烈文侯名憲，閬中人。從岳武穆克復隨州、鄧州等處，破金兀朮兵十餘萬，於臨穎建大功。會秦檜主和議，使張俊、萬俟卨誣以狀，被掠無完膚。三字獄具。遂與岳家父子皆被害。……明追諡烈文侯。世傳張桓侯，顯姓於唐睢陽，揚名於宋武穆。……以桓侯為武穆前身也可，即以烈文為桓侯將士之後身也亦可。前道黎學錦建祠錦屏山下，今久圯未及修復。或云：為侯之宗雖無可考，昔日當有奉祀斯土者，或其族裔也。今祠久圯，謹配張將軍苞，並

子、鄭子。又閔子、澹臺子、陳子，各譜皆錄而藏之。」

<sup>21</sup>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雜錄〉，卷6，頁19。案：清·黃宗羲：《明儒學案》（臺北：里仁書局，1987），卷46，〈諸儒學案〉，頁1089-1090，稱陳晟其學無師承，但致力發揚程朱主敬（主一）工夫，為南昌張元禎（號東白）所稱頌「得真」。徐宗幹為其議例從祀，卻不是從程朱傳承上考量，而是由陳布衣為閩地鄉賢之故。

附祀於祠。禮亦宜之。道光癸卯初秋。(〈藝文〉，卷2，頁19。)

以張苞配享於張飛廟，自是名正言順。但張憲以其閩中前賢，原有祠廟難復，惟能從祀於此，亦無可厚非。然而徐宗幹卻因襲俗說而牽連到張飛、岳飛二人，總不免不倫不類。或許某種意義上，徐氏亦在回應民間對於忠孝節義之士的崇祀心理。同樣的情況在〈復祀唐昭烈侯廟記〉中則主要提及唐代開闢閩地的陳元光。陳元光於景雲2年(711)戰歿，開元4年詔立廟祀之。「自五代及宋累封靈著順應昭烈廣濟王，至今後嗣繁衍，以科名顯。」(〈藝文〉，卷2，頁9。)今漳民尚尊崇為「開漳聖王」。足見則徐氏對先賢的崇敬，偶亦衍至民間信仰。對比前述其對於僧道寺廟的貶抑，其態度頗堪玩味。蓋徐宗幹深知民間信仰對於教化勸善的功能。〈語錄〉即云：

以《玉歷》輯為《簡明玉律》一卷。寄弟書云：「臺人不畏王法，不畏官長，而獨畏鬼。輯此以示胥吏人等。若輩則無忌憚之尤者，亦神奸鑄鼎地獄繪圖之意。」(〈語錄〉，卷3，頁6。)

《玉歷》即指《玉歷寶鈔》，據傳為宋代所出，清代廣為流傳的一種民間宗教善書。內容以宣講地獄與因果報應觀念，內容多係扶鸞所出。徐氏在書院刻書分送時，即常附上《簡明玉律》。〈詩錄〉又載有〈鸞書歌〉，徐氏序云：

六月朔日課諸生于岱麓書院。朱菑圃山長出舊藏鸞書卷子二幅，各長數丈，字大如盃，著紙欲飛，洵仙品也。言蘇文忠公虜筆，藏之數十年，無為跋者。屬題其尾。浣手三，復徬徨，不敢贊一字。菑圃復強之。危坐構思，倦而且寢，午夢方酣，恍惚若有來告者。起而走筆成長歌一章，深慚狂瞽，且懇玷污也。(〈詩錄〉，卷6，頁9-10。)

序言寫出徐氏戰戰兢兢又恍惚入夢之情，實與扶乩的情境相近，足見其對於此道並不排斥。〈語錄〉又有二則，可知徐氏治臺時，善於神道設教：

臺地民間俗有迎神會，請北港天后像，舁至郡城。而又以郡中各廟神紛紛迎送。男婦雜沓，幾至舉國若狂。晝夜街市喧鬧，梭織往來如蟻。太守全礪南因會首每迎神入郡，必卜筮問神行止。乃密與廟祝錢，使詭言神不出行，消弭紛擾於無形。此惠民而得其術也。

臺俗迎神，舉國若狂。然無敢為匪者，此亦本體之明，未嘗息，而偶一復初

也。神道設教，不必禁之。（〈語錄〉，卷2，頁6、16。）

二則記載，描述了臺灣迎神賽會的盛況。徐氏便以為不必打壓，反而可善加利用神道勸善懲惡，安定民心。正因為如此，若干不在官方祀典之諸神。<sup>22</sup>徐氏亦會因地制宜的修整，甚至創建。如咸豐2年臺灣道任內重修風神廟。（《年譜》，頁100。）《文編》另載有〈創建雷祖廟記〉云：

臺郡舊無雷公廟，唯春秋設壇與風雲並祀。咸豐元年，同裕子厚郡守重修先農壇廟告成，因創建雷祖廟於右。每歲耕藉禮畢祭之，永為例。臺灣居海東，震東方也，宜祀於東郊。龍興雨作，土脈奮起，百穀茅甲，其得氣之先乎。且臺地屢震，交夏時有颶颶為災。聞雷則皆止動於上，故靜於下，氣暢而弗鬱。諺曰：一雷解三颶。理固然也。（〈藝文〉，卷4，頁12。）

震為東方，無論天雷或地雷（地震），或多或少與易理相涉；但「一雷解三颶」，便出於臺地的時則俗諺。足見徐宗幹對俾益治道的民間信仰、風俗，多有推揚。〈語錄〉便載其所模擬的「聖母勸世語」：

我愛孝友，進香不如敬父母；我護善良，燒香不如做好人。你若犯法，拜我不能饒你；你若為匪，求我不能免你罪。（〈語錄〉，卷2，頁6。）

這類直白的勸世語，最常見於城隍廟的警世楹聯中，徐宗幹就記載曾與其友劉沂泉同住燕園，夜夢城隍命徐氏作聯，其聯云：「這也是衙門，但專為奸盜邪淫而設；誰不知道理，要實在賢良忠孝無虧。」沂泉醒後，夜起秉燭記之。（〈雜錄〉，卷1，頁17。）綜上所述，徐氏對無關民生教化的寺廟，徵其田租院址為義學；對勸善安邦的信仰，則資取為政令宣傳所用。

## （二）親蒞課士、力整學規

上節略可窺見徐宗幹對於地方文教在建設方面的籌劃與推動。在科舉時代，修繕學宮算是地方官吏的本分事，尚不足以凸顯徐氏右文興學的熱衷程度。此節則專

<sup>22</sup> 如明·申時行等：《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卷94，頁1云：「洪武二十六年，著令天下府、州、縣，合祭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孔子及無祀鬼神等，有司務要每歲依期致祭。」清代在此基礎上有所增刪，此即所謂官祀諸神。

論其在書院內部的事務與相關文教內容上的建樹。首先徐宗幹除了修繕學官、興復書院，設立義塾外，在山東任上更積極親督諸士課業。《文編》記載〈諭書院生童〉一文云：

書院之設，非徒課文詞也，所以造人才、敦士品也。諸生文藝稍優者，大半皆赴省闈試，而本司道仍按課親蒞，又加小課以訓習之，無非欲爾等端精學問以收放心，不至干預外事，閒居為不善耳。……夫子弟為非，他人則漠然置之，其父兄則必深惡而痛懲之。何也？愛之切，故憤之深也。其有溺愛於先，卒至不能制者，則有望於地方有司及學官矣。……視爾等為百姓之子弟，則成敗聽之；視爾等如自己之子弟，則不能不愛之切而憤之深也。寬之，正所以害之，是與溺愛之父兄等。披枷帶鎖，人人指視曰：此某某之子弟也。爾父兄能無愀然？受刑坐牢，人人指視曰：此考試時所取錄之生徒也。本司道能無愀然？思之！慎之！（〈官牘〉，卷5，頁22。）

徐氏言之諄諄，將生童與學政的師生關係，進一步用家庭倫理繫聯。由書院生童來說，入泮讀書，考取功名是當時躋升上層的主要途徑。但由地方官吏來看，能籠絡有志之士入學課讀，既可宣明教化；更有助於安定地方。因為未來這些生員既是學院山長、儒學訓導的學生，也成為官府推動各項安民、籌餉、團練等政務，乃至於偵察地方匪首的耳目。《文編》所載〈覆玉坡制軍書〉，便點明了這點因素。當時同僚或有訾議徐宗幹只忙著刊書課士，頗有荒廢政務之嫌。徐氏先辯明自己核辦公事從無停擱、積案，閒暇閱書亦係講論吏治及海防，並非別弄文墨。又云：

至於課試生童，一月中有兩日親駐書院，與教官同飯。廳、縣各員，頗有「不必如此」之論；不知其中實有隱衷。宋富弼云：「兇險之徒，讀書應舉，仕進無路，心常怏怏」。此輩在民間密相結煽，縱無成謀，實能始禍，當設法以羈縻之。臺郡健訟好鬥及易滋事端，往往有粗知文義刁劣之徒，暗中主謀，又無跡可按，藉此牢籠。近年以來，似覺鴉音稍變。課卷係署中侄輩校閱，將餘出修脯，贍補貧生；其選刻文字，亦署友代校。（〈官牘〉，卷5，頁18。）<sup>23</sup>

<sup>23</sup> 清·丁曰健：《治臺必告錄》，卷5，頁12，題為〈上廖儀卿座師書〉云：「至近年士習似覺稍有起色，非能棄末返本，借文字以鼓舞之。不知者或以為事非所急，且近好名，而於地方無益。未知內地來臺者，民固多莠民，士於少良士。宋富鄭公所謂：兇險之徒，讀書應舉，仕進無路。此輩常在

一般尚武嚴法的官牧，對於學政之課士、刊書，視為舞文弄墨，博名炫才之舉。但徐宗幹對官長則詳細分析其中隱含原委，並引宋臣富弼之奏議，以明仕途對於安定士子心志之重要。<sup>24</sup>誠然，由官民的利害關係來看，科舉的政治功能十分強烈。但徐宗幹對於士民，則多著眼在教民如子的關係上發揮。如前引〈語錄〉所云：「州縣之於民，父之於子也。當督之以嚴。太嚴，偶濟之以寬。」徐宗幹重視學校的功能，也反映在他十分注重科考相關事務上。首先如《文編》詳細記載了嘉慶 14 年(1809)其父陪同場試的詳細過程，包括之前的準備、試題。鄉試時父子同時入闈，其父見考筐中有兩硯，疑宗幹誤置，乃冒雨踐泥送至。又回憶其父「入闈十六次，疊次房薦，未能一第。余弟兄並成進士者，皆先大夫一生勤苦之所致也。」因此記述先輩所言「天之與人以科名，並其數代計之。故年少早登科第者，其祖父類皆困於場屋多年也。」(〈雜錄〉，卷 6，頁 20-23。)徐宗幹對於當年科考過程能描述得如此歷歷在目，一則感恩先父的勤苦與慈愛；二則也是科考在其人生中佔有重要的意義。故《年譜》中歷載道光 8 年、11 年、14 年於山東諸任內充鄉試同考官；24 年汀漳龍道任內入闈監試。(《年譜》，頁 40、43、48、73。)臺灣道任內，凡道光 28 年、30 年、咸豐 3 年歲試以及道光 29 年、咸豐元年科試等諸事。(《年譜》，頁 83、90、102；86、94。)尤其在汀漳龍道入闈監試時，自注復提及其五世祖初任福建永安縣，亦曾入闈闈。為此擬聯題於監試堂云：「人文大會六千士；祖武重繩二百年。」《文編》亦提及考試擇才的要點：

考試之要，只在恭、寬、信、敏、公五字。一味刻覈，有犯必懲，非為子孫留讀書地步；一味姑容，寬縱滋弊，亦非為子孫留科名地步。(〈語錄〉，卷 2，頁 11。)

民間密相結煽，縱無成謀，實能始禍；當設法以羈縻之。是誘掖佳弟子之中，實隱以牢籠若輩。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得一二善良者，與官長氣脈相連，每默消禍患於無形。各屬漸去貪婪之習，於詞訟曲直易明。即考試得舉錯之公，頑愚亦聞而心服，似與地方習俗不相涉而實隱隱相通。此稍見安定之實在情形也。」可與此文互參。

<sup>24</sup> 宋·趙汝愚編：《宋名臣奏議》，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19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44，頁 12，富弼〈上仁宗乞採訪京東狂謀之事〉：「臣後來察訪京東一路，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洎至長立，所學不成，雖然稍能文詞，又多不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因茲張大胸臆，遂生權謀。」

又〈庚戌歲試手諭〉云：

童試為國家取士之始。凡公正考官於取黜之間，鬼神鑒之。此本學政之所以每屆考試，必昭告于城隍也。嘗有為弟子鑽謀徼幸，成名不久，或喪身、或敗家，此逆天之報，求榮而反以自害。何如安分讀書，自然獲雋之身名俱泰乎。今之顯達者，多由先世為官清白，本學政即不為聲名計，未有不為子孫計者。在內地各省歷任縣考錄，一秉至公，豈至海外而初心忽變乎。（〈官牘〉，卷6，頁24。）

徐氏自陳歷任魯閩各省考試，至臺灣後以道台兼學政使，其取士原則如初。該牘又提及：今有代替舞弊之事，故耐煩剴切為生童諄論，爾後斷不容再有頂冒槍替、舞弊作奸之事發生。故《文編》所載道光28年、咸豐元年、2年等3篇〈告城隍文〉中便有「本年歲取生員名次，備列上陳。自念寒儒出身，不敢昧心去取。有不明，無不公，諒邀神鑒」諸語。（〈藝文〉，卷4，頁5。）希望藉由神人共鑒，期使考官不敢貪賄徇私，考生不敢槍替舞弊。

因此徐宗幹在高唐知州任內修整鳴山書院，並親自課士。《年譜》云：

課士於鳴山書院，遠方來學者畢生道遠成翰林。闈前，每月諸生攜衣囊至院，為之授餐，凡三日，一如闈試。歸則經策並習。次月投繳再課，亦如之。（《年譜》，頁53。）

這種在鄉試前期，令諸生到書院，授餐並親自督課的方式，一如闈試的模擬。在濟寧時，「書院課士規條一如高唐時。」課試的內容，「大課外，兼課經史論文說。」自臺灣解任，幾經輾轉至咸豐7年於浙江按察使任內，徐氏仍亦課敷文書院，並依次督課崇文書院、紫陽書院、詒經精舍。（《年譜》，頁144。）正符前引徐母所言「汝等之官長，尚不改書生本色。不善作官而善課徒。」故其於〈漁山書院示諸生〉詩中亦自道：「愧我一日長，患在好為師。」（〈詩錄〉，卷10，頁2。）至於其於臺灣道任內，《年譜》所著墨於平定民亂，似乎無暇親課生徒。但如施士洁〈臺澎海東書院課選序〉云：

道、咸間，崇川徐清惠公（即徐宗幹）以巡道兼督學，雅意振興。如期按課論文外，有背誦經書之課；復加小課，以賦詩雜作相與切磋。風會既開，於

是乎有課藝之刻。<sup>25</sup>

則知徐宗幹在臺灣海東書院，亦比照在魯的課士方式。前引〈覆玉坡制軍書〉即有「課試生童，一月中有兩日親駐書院，與教官同飯」之語。再考《治臺必告錄》所錄徐氏〈寄浙撫梁楚香中丞書〉云：

火烈勝於水懦，惟其克明克允耳。士習尚易整頓，五月間歲試頗極安靜，經古並有可觀。舊有海東書院，肄業者三百餘人，各街巷晝夜俱有書聲，內地所罕聞也。<sup>26</sup>

故連橫《臺灣通史》稱徐宗幹任臺灣道時：

力整學規，拔其尤者入院肄業。每夜必至，以與諸生問難，訓之以保身立志之方，勉之以讀書作文之法。一時諸生競起，互相觀摩，及門之士，多成材焉。<sup>27</sup>

足見其於臺灣海東書院之課士，實如在魯省一般地投入。除了親自課士外，如連橫所言，徐宗幹更力整學規。清代各級儒學多遵制將順治 9 年所頒發學規，刊立臥碑於明倫堂，以為教育根本。《文編》載有徐氏〈試院諭諸生〉凡保身、敦行、積德、養氣、篤志、專心等 6 條。（〈官牘〉，卷 6，頁 22。）在四川時則整飭義學中延聘教讀「率多濫竽充數。更有以己名膺聘之後，另倩他私行代替，本人則坐食束脩，未與訓課之事。所倩之人，又不朝夕于斯。或僅月一至焉，竟有學子弟，未識教師之面」等亂象。（〈官牘〉，卷 3，頁 7。）前引〈庚戌歲試手諭〉即肇因於道光 28 年科試中嘉義縣職員劉思中等人徇私舞弊案，其〈上兩院書〉即云：

臺地考試，積弊已久，遽難轉移。惟以賄行求之風，斷不可稍存萌孽，而奸徒指官撞騙與污蠹名節者何異。（〈官牘〉，卷 5，頁 6-7。）

因為此事涉及徐宗幹姻戚在內，故具奏自請處分。這類頂替貪賄而包庇舞弊諸事，

<sup>25</sup> 施士洁：《後蘇龕合集》，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文獻叢刊》第 21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文稿卷 1，頁 353。

<sup>26</sup> 清·丁曰健：《治臺必告錄》，卷 5，頁 14。然《斯未信齋文編》於此篇題為〈上廖儀卿師書〉，且無海東書院一段文字。

<sup>27</sup> 連橫：《臺灣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卷 11，頁 192。

自古即今，層出不窮。然科考即是為國掄才，涉及名教之大事。如不求公正嚴明，不僅於官吏貪墨，更會引發民怨。故徐宗幹自不敢等閒視之。

### （三）廣刊書籍、激勵士風

除力整學規，親自督課外，徐宗幹更會積極刊刻相關書籍、圖像，激勵士風，敦明教化。《文編》曾云：

郡城內，官紳設義塾四五處，並捐貲為倡。按月委學官稽察功課。偶親往，獎以筆墨，以聖像拓本分給，敬謹供奉。又以《孝經正解》（自注：六世祖見行公著。）等書，並《聖諭廣訓直解》，存各塾中。令其師時時講解。或曰：「海外陋俗，為之無益。」然究竟知書識字，即為農工，有犯上作亂者。盡吾心焉耳矣。（《語錄》，卷3，頁7。）

但不惟《孝經正解》、《聖諭廣訓直解》諸書，如前施士洁云徐宗幹以巡道兼督學後，海東書院「於是乎有課藝之刻」。早在徐氏仕魯期間，如道光 21 年便「輯修州乘及《濟寧金石志》」、「編《濟魯課士錄》二十餘卷，採輯歷任各郡邑今昔耆儒未達者及後學新進詩文，並及古近雜體。考辨諸體佳者，選而附之」（《年譜》，頁 58-59。）綜《年譜》所述及，凡道光 6 年補刻《同善錄》、16 年刊《同善錄續編》諸書及《虹玉樓存稿》；25 年刊《濟州金石志》；28 年刊見行公《孝經正解》、《徽郡志略》、《測海錄》、《婁嘯亭味腴堂詩稿》、重刊《陰鷲文》、重刊《覺世經詩》、翻刻孝弟圖、閨範圖等；29 年輯《兵鑑》三卷、重刊《虹玉樓詩賦選》增輯《斯未信齋語錄》、《文錄》、《詩錄》。刊《東瀛試牘》初二集、《瀛洲校士錄》初二集；30 年輯《簡明玉律》、著《治臺必告錄》、刊《東瀛試牘》三集、《校士錄》三集、輯《正字略揭要》；同治 2 年刊《斯未信齋文編》等等。（《年譜》，頁 39、49、75-76、85-86、89、93、167。）楊永智《明清臺南刻書研究》一書提及徐宗幹在臺灣任內活用刻書，推動科舉文風、政治教化、社會教育等施政，凡有 23 種。<sup>28</sup>上述諸書大致可概分為以下數類：

<sup>28</sup> 楊永智：《明清臺南刻書研究》，頁 106-113，凡錄：《測海錄》、《孝經正解》、《流風遺澤書冊》、《聖諭廣訓》、《兵鑑》、《虹玉樓詩賦選》、《瀛洲校士錄》初二三集、《東瀛試牘》初二集、《噶瑪蘭廳志》、《亦佳室詩文集》、《潛園琴餘草》、《荀湄公年譜》、《斯未信齋奏疏》、《斯未信齋集》、《全臺閩幽錄》、

官方史志文獻，其一是方志，徐宗幹至少監修了《泰安志》、《高唐州志》、《濟寧直隸州志》3種。在泰安任上又重刊《泰山道里記》、《泰山小史》（《年譜》，頁45-46。）徐宗幹道光20年〈濟寧直隸州志序〉即云：

古云不習為吏視已成事。郡邑之志乘，其政治之方策乎。抱殘守闕，援據綜覈，先詰之功也。補遺繼續，斟酌通變，後人之職也。志以傳信，非以時修訂，久將就湮。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事有興替，今古殊科。道有弛張，先後異制。至於疆域之廣輪，河渠之原委、里俗之利病，前賢言之詳矣。所謂已成事也，有治法、有治人。余何贅焉。<sup>29</sup>

因此修方志不僅幫助現任官吏了解地方利弊得失與施政要點，累積經驗以為後人指引。故明清官吏即便著意修志，有其用意。另一種則是金石志，便不是任何地方官員所必須從事者。《文編》載〈濟州金石志序〉云：

嘗考濟州金石甲於天下，而濟寧金石尤甲於東省。……予自戊戌涖濟以後，公事之暇，每逢漁山書院課期，輒與山長許印林、商城楊石卿諸君，譚及金石一事，娓娓不倦。乃不惜重貲購求金石遺文，并捐廉遺拓工於本城內四鄉及金、嘉、魚三縣，學宮、寺觀、深山穹谷。凡有金石刻文，靡不椎搨殆遍。日積月累，盈箱滿架，適纂輯《濟寧州志》，已成四十卷，尚未告竣。而《濟寧金石志》八卷業已完備，因先梓行。（〈藝文〉，卷1，頁12-13。）

蓋因魯地歷史悠遠，人文匯萃，金石文獻較之其他地區豐富蘊深；亦由於徐宗幹個人興趣所致。該《金石志》徐宗幹投入心力甚多，由《文編》載錄了多篇金石題跋，〈雜錄〉中如在濟州普照寺存崇禎所製大炮甚多，又得漢畫像石，乃移置於漁山書院壁間。泰山下新獲白馬寺碑。岱麓老君堂內有醫虎小像，移之山腰伏虎廟。（〈雜錄〉，卷1，頁3-6。）可見其對蒐羅金石碑刻拓搨之熱衷。

個人文集之類又可分為3種：其一是徐宗幹先祖之作，如其六世祖見行公所著

---

《斯末信齋文編》、《斯末信齋詩錄》、《金筌臆言》、《斯末信齋主人自訂年譜》、《治臺必臺錄》。只不過楊氏所序列者，有作序者（如《全臺閩幽錄》，《文編》題為《臺灣周邠圖島上閩幽錄》）、有題跋者（如《亦佳室詩文集》），亦有鑒裁者（如《噶瑪蘭廳志》），未必皆出自徐氏之手。筆者以為：當依《年譜》為準，較符實情。

<sup>29</sup> 清·徐宗幹等：《（道光）濟寧直隸州志》，「徐序」，頁1-2。

《孝經正解》、五世祖傅巖公（《文編》中多稱巖叟公）所著《同善錄》、《同善錄續編》、《恒山政績》及《徽郡志略》等。據〈流風遺澤書冊跋〉記載，其家族藏書存虹玉樓；歷數傳，散佚幾盡。徐氏童年時尚不知檢而藏之，至丁母憂時方偕諸弟留心采輯遺書。（〈藝文〉，卷4，頁3-4。）刊行《同善錄》等尚屬子孫繼志述事；但如〈恭跋孝經正解〉所稱：

昔年巡漳南時，以《同善錄》、文昌、孝經及孝弟圖等授諸生，今漳人士翻刻印訂若干部，附海艘而來，散與臺郡海東書院子弟，以資蒙養之助。顧膺民主於勸善，而課士務在宗經。爰取所藏《孝經正解》，敬謹復校，登之棗梨，付各師生為庠塾讀本。（〈藝文〉，卷4，頁2-3。）

則已將家族著述視之為庠塾輔助教材。其二則是徐宗幹本人之著作，如《斯末信齋語錄》、《文錄》、《詩錄》（同治2年合刊為《斯末信齋文編》）、《斯末信齋主人自訂年譜》等。另有若干未收入文集之專著，如《治臺必告錄》，後交由丁曰健所續。《兵鑑》依其自序所言：「昔陳文恭公輯五種遺規，而不及將帥，蓋仕學從政，已足以該之矣。茲編即以為專闡遺規可也。」（〈藝文〉，卷4，頁10。）是不談形勢、陣法，而論統兵治心之道。《測海錄》則為「爰取前人防洋籌海諸書，參以臺陽志乘及稗官雜記、里俗傳聞，條分其說，歸於簡明。俾海上游者便覽觀焉。」（〈藝文〉，卷4，頁8。）上述三書皆是針對治政實務，匯集前人著述言論所成。至於《虹玉樓詩賦》，據〈虹玉樓賦選序〉云：

自垂髫侍庭訓，習律賦，積百餘篇。及官泰山下，出篋中示童子。齊魯諸生請梓行，執掌無暇，草草授剞劂氏，並編入《課士錄》，行世二十餘年矣。丁未，復出山，板藏於家。旋渡臺，視學書院。生徒有肄業及之者，而不能遍觀為憾。吾鄉亦瀕海，乃寄書附商艘載之來；出狼山港，遇颶風漂沒。詞章小技抑末也，宜海若怒而沈之。然無以應諸生徒也，節取若干首，復災棗梨，刊印散佈；仍望諸生敦崇實學，為雅頌之才以黼黻昇平，無徒以雕蟲為也。（〈藝文〉，卷4，頁2。）

雖然是徐宗幹個人少年以來所累積之賦作，但在道光12年、29年兩次刊刻皆為書院諸生習舉步趨之用。第三種則是鄉賢文集，雖然《年譜》提及「採輯歷任各郡邑

今昔耆儒未達者及後學新進詩文，並及古近雜體。」此類多收入合輯之《濟魯課士錄》中。此外在修纂方志時，徐氏亦同時刊行相關賢達著作。如曲阜名儒桂馥之相關著作《說文系統圖》，摹而存之諸漁山書院。（〈雜錄〉，卷1，頁7。）《文編》又多有為前賢序跋者，如《周敦山遺稿》為同鄉世交周敦山之塾課詩文遺稿；《亦佳室詩文集》則為其師同安蘇鼇石之遺著；《味腴堂詩稿》則為同鄉及同補弟子員之婁嘯亭遺稿。（〈藝文〉，卷3，頁11、18-19；卷4，頁1。）至如《顧儀卿孝廉制藝存稿》，徐序提及：牧高唐時，延顧氏為鳴山書院主講，其月課之暇擬作，已編入《齊魯課士錄》中，此次再以專集行世，期有裨於後學。

前文數度提及《濟魯課士錄》乃是「採輯歷任各郡邑今昔耆儒未達者及後學新進詩文，並及古近雜體。考辨諸體佳者，選而附之」，可說既是塾課的參考教材，又算是習作佳構的集結。上述徐氏《虹玉樓詩賦選》、顧儀卿《制藝存稿》都曾收入。塾課的參考教材，除了上述文集之外尚有如《正字略揭要》，還有《新科鄉試合轍》，徐序云：

近得新科闈墨，次第評輯，聊為家塾子弟舉業指南。諸同人憊憊付梓，唯以未能廣收為憾，而總不離乎平正通達，不隨風氣而變，亦不因遷地弗良，攸往咸宜，推行皆利。所謂軌迹夷易，易遵也。（〈藝文〉，卷3，頁5。）

因此徐氏對於蒐羅科考範文，頗為用心。20餘卷的《濟魯課士錄》今佚，《文編》亦未留有序跋，已難考其貌。至於在臺灣督課的佳作，則有《東瀛試牘》、《瀛洲校士錄》。兩書皆刊行了初、二、三集。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尚度藏第三集上、下卷，收錄吳敦仁、潘乾策、許廷崙、韋國琛、吳敦禮等人作品，其上並署有「受業吳敦禮校」之字樣。〈瀛洲校士錄序〉詳述二書編纂原委，並明其收錄範圍云：

解經為根柢實學，能賦乃著作通才，故考錄制藝雅馴者，已編為《東瀛試牘》；而說經、論史及古近雜體詩文並肄業及之者，哀輯二卷，曰《校士錄》，俾庠塾子弟有所觀感，而則效焉為誘掖獎勸之助，藉以鼓舞而振厲之。（〈藝文〉，卷3，頁12-13。）

即《東瀛試牘》收制藝之文；《校士錄》乃經史論述與詩文，二者都希望書院生徒習業時參考仿效。前引〈覆玉坡制軍書〉中提及當時理臺的武弁吏員非議徐宗幹熱心

舉子課業，以為「辦公而外，應節勞，勿親書籍，妄耗心血。」〈東瀛試牘三集序〉則復力陳興學課士對於安定地方的功能：

客有自海上來者，謁余而問曰：「臺陽，巖疆也；使者，兼兵刑劇任也；苟有餘力，盍少自暇逸！乃萃諸生徒，擁皋比、弄鉛槧，何子之不憚煩？且政事得無荒否？」曰：「方言不同，以文字通之；獷俗不擾，以詩書馴之。舉善則民勸、舉直則民服，校士與牖民，似不相謀而實相感。制科取士，賓興賢能，化民成俗，一以貫之者也。作吏二十年，此事未廢；矧忝為學臣！敢廢學乎？」客曰：「仕不忘學，既聞命矣；所謂學者，豈唯是絺章琢句，絜短長、較工拙云爾哉？抑弋虛名耳！」曰：「不治其流，曷溯其源？不揣其末，曷尋其根？由文而行，由藝而德，引以正鵠，則心不外求；範以馳驅，則才不泛鶩。有以取之，無自棄也；有以榮之，無自辱也。誘掖以此，獎勸亦以此。余豈導人以好名哉？余不得已也。」客唯唯而退。（〈藝文〉，卷4，頁1-2。）

此段文字最能表露徐宗幹每於所宦州縣興學的宗旨。中國幅員廣大，南北方言歧異。臺地之語更別於徐氏久處蘇魯之北方官話。政令之宣諭與士民之撫教，惟有文字足以相通而不分。因此「校士與牖民，似不相謀而實相感」，旨哉是言。徐氏自言「作吏二十年，此事未廢；矧忝為學臣！敢廢學乎？」故自魯至川，臺、浙至閩撫，無不以書院課士為其志業。從身分上看，徐宗幹洵為由基層逐步歷練的方面大員；但處事上看，除必須應付清末各地的民亂動蕩外，稱之為積極推動文教的教育家，當亦名實相符。至於徐氏欲辨駁治學不應在「絺章琢句，絜短長、較工拙」的質疑，提出「由文而行，由藝而德，引以正鵠，則心不外求；範以馳驅，則才不泛鶩。」但觀明清書院，率習八股制藝之文，無復兩宋尋蹟心性源頭，甚而針砭時務的士風，卻是不爭的事實。但此文風下趨的潮流，已近數百年。徐氏囿於時見，吾人亦無足以厚責。

除了上述較為主要的書籍外，徐氏尚刊刻一些與教化有關的書籍。如《聖諭廣訓直解》（或為《聖諭廣訓衍義》）、《陰騭文》、《覺世經詩》、《簡明玉律》，並翻刻孝

弟圖、閩範圖等。<sup>30</sup>《聖諭廣訓直解》乃是集皇上教諭，用以宣講勸民者，屬於明清時期政令宣傳的教本。〈發《聖諭廣訓》札〉記錄宣講方式特詳：

前在山東州縣任內，准藩署刊發《聖諭廣訓衍義》一書。除朔望循例率師生敬謹宣講外，於三八大堂放告之期，署前恭設高案，派禮書聲音高朗者讀一、二條。鄉民環聽如堵。下鄉勘驗事畢，即於集場或鄉村內，令隨行書吏講數條，俗言里語，婦孺皆能通曉。書院課期及查義學之日，選諸生一人，每期誦三、四條；周而復始，酌加獎賞；書吏給茶資數百文。行之幾及二十年。後至蜀、至閩，亦如之。及巡臺時，土民言語不通，則以土音譯誦。臺署舊有刊板，名為《直解》，與前書相同。此書成於康熙年間，並行之海外已久，重加刊訂，分送僚屬，行篋中尚存一本。江友竹太守現已翻刻工竣，即刷訂另備公牘轉發。（〈官牘〉，卷7，頁7。）

據此札所述可知：在魯時徐氏用《聖諭廣訓衍義》宣講；在臺則逕用署存舊刊《聖諭廣訓直解》，蓋書為嘉慶25年（1820）4月江蘇上元舉人葉世倬以臺灣兵備道身份蒞臺，即任後所刊，雕版曾收藏臺灣府學孔廟典籍庫。前述提及《簡明玉律》當屬《玉歷寶鈔》一類宣講地獄與因果報應觀念的民間宗教善書。《陰騭文》，全名《文昌帝君陰騭文》，據傳成書於宋元之時。《覺世經詩》者，宜與《關帝覺世真經》有關。三者皆不脫乩壇飛鸞，託名仙佛降筆所成的勸世書籍。道光16年《彰化縣志》提及彰化文昌祠云：

國朝嘉慶六年奉詔編入祀典，春秋致祭，與武廟同。蓋以世所傳帝君之書，如《陰騭文》、《感應篇》、《勸孝文》、《孝經解》諸書，皆有裨於教化，不失聖人之旨。故學者崇奉之，使日用起居，皆有敬畏，非徒志科名者祀以求福也。今彰邑文祠極盛，大率士子鳩金公建以為敬業，會文之所而藉神明以儆身心，文風所由丕振也。<sup>31</sup>

<sup>30</sup> 至於楊永智《明清臺南刻書研究》所言徐宗幹作序之《全臺閩幽錄》，據《文編》所錄〈臺灣周邠圖島上閩幽錄序〉云：「曩官山左，歷任泰山、高唐、濟寧各州邑，仿吾鄉陽湖彙報節婦請建總坊之例，詳請旌獎者，統計凡數百人。……年來採訪條約責之師生，卒無以應。今將回帆內渡，周生邠圖以所編島上《閩幽錄》相質問，雖搜輯不無遺漏，而敘次百餘人，已思過半矣。」則內容為節孝人物傳略，藉此勸翼民俗，崇尚氣節。參清·徐宗幹：《斯末信齋文編》，〈藝文〉，卷4，頁19-20。

<sup>31</sup> 清·周璽等：《彰化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庫》初集（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0），

因此在清嘉慶以後，文昌信仰更為附益到學宮、書院之中，既成為院生祈求功名所託，又對黎庶百姓起勸善教化的功能。為此，徐宗幹在刻書分送時亦一併刊行這些民間信仰善書，廣佈流傳。綜上所述，徐氏所刊書籍，雖有官方應盡之職責所在者，亦有因個人興趣而有助於地方文史。雖不免顯揚先祖、鄉賢，但多要能裨益士子舉業，或能對百姓勸賞儆惡者。無不用力擴加刊刻拓印分送。

### 三、徐宗幹所傳孔子圖像相關問題

#### (一) 文獻紀錄與發現過程

前述徐宗幹刊刻相關書籍時，亦翻刻孝弟圖、閨範圖等。此外，徐氏更拓印孔子聖像分給學子，這亦是徐宗幹繫聯魯臺兩地孔廟淵源最大的貢獻。《自訂年譜》即詳載其為魯、川、臺三地孔廟立孔子聖像碑之事：

（道光 6 年，山東泰安縣任內）敬摹曲阜聖廟行教像、鄒邑孟廟聖像，立石岱頂孔子廟。

（道光 23 年，四川保寧府任內）敬摹聖像，立石學宮。（自注：蜀中廟學皆木主）

（道光 30 年，臺灣道任內）重摹聖像、亞聖像，敬立石於學宮。（《年譜》，頁 40、69、93。）<sup>32</sup>

故知現存於泰山孔子廟、臺南孔廟者，並非僅有的兩幅，蓋原在四川亦立了同樣的聖像。而且在保寧府府學復「敬摹曲阜廟碑杏壇二字拓本，立石學宮。」《文編》載刊拓原委云：

昔任泰山時，敬摹先聖、亞聖兩像於泰山頂。以拓本奉至蜀中。都人士以得展謁先師遺容，喜幸無已。蓋蜀中廟學皆木主也，敬重摹勒石郡學。又覺門

卷 5，頁 4。

<sup>32</sup>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主人自訂年譜》，頁 40、69、93。

外西有大桂一株，東有亭供奉夫子講座。因以舊藏闕里所拓黨懷英「杏壇」二字，立石北向。取桂杏聯芳之意也。（〈雜錄〉，卷 2，頁 3。）

在漳州時遇有友朋院生，徐氏輒云：「余行篋中有曲阜所得黨懷英書『杏壇』二字拓本，加跋語贈之。」（〈雜錄〉，卷 3，頁 3。）是徐宗幹治魯時得自曲阜聖人之鄉的聖像與杏壇拓本，正做為獎勵士人最佳的禮物。如前引〈語錄〉即言在臺灣道時「郡城內，官紳設義塾四五處，並捐貲為倡。按月委學官稽察功課。偶親往，獎以筆墨，以聖像拓本分給，敬謹供奉。」〈雜錄〉又云：

嘗以泰山頂所刊闕里先師及亞聖拓本，授學官敬藏。學宮有石生耀祖請再摹刻，至廈門取將樂石鐫完，航海而歸。謹搦以授書院習經諸幼童，各奉安於塾。庚戌（按：道光 30 年，1850）八月初八上丁前一日，諸生備樂器齊集，以彩輿二，恭請石像入學，供奉於崇聖祠東殿。其舁輿及執儀仗樂器者，皆弟子員及佾舞文童。是日又奉文，請謝子良佐入廡從祀。禮成後，行樂舞。海外彬彬鄒魯之風，且勝於中邦。惜乎官斯土者，皆惜為互鄉耳。（〈雜錄〉，卷 4，頁 10。）

因此，臺南府學原藏只是泰山孔子廟的拓本，但經石耀祖所請，再至廈門摹刻返臺，藏於崇聖祠東殿（約今日以成書院所在）。迎像之禮，選在八月上丁秋祭之時，比照入祀的禮典，有儀仗、樂器引導。同一時間亦安奉謝良佐神主入祀。更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所云「其舁輿及執儀仗樂器者，皆弟子員及佾舞文童。」其實即為今臺南孔廟樂局——以成書院之前身。據以成書沿革所述：道光 15 年（1835）時鳳山秀才蔡植楠提議設置聖廟樂局，以教諸生習樂、舞佾。遂與吳尚新、劉衣紹等人捐獻鉅資創設樂局，咸豐時吳孰禮出資購地捐獻給樂局，以田畑收入維持樂局運作，是為以成書院之前身。<sup>33</sup>吳孰禮，當即吳敦禮即徐宗幹門生，今《文編》猶收錄〈示吳生敦禮書〉討論經義。（〈藝文〉，卷 3，頁 22-23。）《瀛州校士錄》收有吳氏之詩作，

<sup>33</sup> 林開登編：《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三四週年誕辰釋奠暨以成書院一五 0 週年特刊》（臺南：臺南巽文廟管理委員會，1984），頁 4。至光緒 17 年（1891）工部郎中職員陳鳴鏘憫文廟聖禮雅樂將淪，乃取古樂八音，加餅鼓、三音、叫鑼、鱷鐸、雙音等化為 13 種樂器，聘王縣令少君為樂師，林協台公子林二舍為顧問，邀集地方文士，研練禮樂，名曰以成書院，並推進士許南英為董事長，禮樂生仍以秀才或童生為之。

本人亦參與校對工作。以上是徐宗幹自述的文獻記載，尤可考見清代臺南孔廟的運作方式。

徐氏歷任魯、川、閩、臺，但孔子圖像只留在泰山、臺南二地，四川者已佚。何以如浙江、福建二地未有立石學宮之舉？已難考知。以下略述二圖現況：首先談泰山孔子廟。泰山之有孔子廟，據明代查志隆《岱史》所云：

孔子至聖殿，在嶽巔，玉皇頂西稍下，可半里許。其地相傳為越觀峰，其下為孔子崖，意者《韓詩外傳》所云：孔子登泰山望見吳閭門白馬，以示顏子，此豈即其地耶？嘉靖間，尚書朱衡謀拓基於此，構建祠宇以奉孔子，迺遷任弗果。萬曆十有一二年間，前任濟南府郝推官大猷創議，建正殿三間，前為門一間，四圍垣牆俱全，專為崇奉孔子設也。又以遷任，未及安神奉祀以竟其事。今鹽臺侍御譚，檄脩《岱史》，稽考勝蹟，有司議請重修前項殿宇，奉孔子神主，配以顏曾思孟，悉如學宮之制，春秋行釋菜禮，仍於殿之兩偏，構道房居黃冠以供掃除云。<sup>34</sup>

《岱史》又錄有〈安神祝文〉、〈訂定常祀祝文〉以及〈查志隆岱巔脩建孔廟議〉。查志隆萬曆 14 年此議提及「然聖哲中之有孔子，猶山阜中之有泰嶽也」，又云：「於殿內設立孔子神座神主，正中南向，而東西配以顏曾孟，併入子思各神座神主，東西相向，一如學宮之制。」依查氏所言，該廟本為紀念孔子望吳勝蹟所建，嘉靖間由朱衡謀首倡拓定基址，萬曆時郝大猷營構殿宇，至查志隆則議續成祀事。廟中以孔子與顏曾思孟四配神主，如學宮之制。考嘉靖 9 年採大學士張璠之議，以為：塑像之設，中國本無；至佛教入中國始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時，已只用神主而不設塑像，惟北京國子監塑像，乃因前元之舊不忍毀，今宜天下一制，廢塑像而立木主。<sup>35</sup>故萬曆間泰山所新設之孔子廟，自以神主為定制。但據乾隆年間唐仲冕編《岱覽》時，則泰山孔子廟復有孔子坐姿石像。<sup>36</sup>至道光年間，徐宗幹任泰安知縣，摹

<sup>34</sup> 明·查志隆：《岱史》（合肥：黃山書社，2008），卷 10，頁 2。

<sup>35</sup> 明·朱厚燾：《嘉靖祀典考》（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烏絲欄鈔本），卷 5，頁 5 之 1-6 之 1。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網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2016 年 10 月 5 日上網）。

<sup>36</sup> 清·唐仲冕編，嚴承飛點校：《岱覽點校》（泰安：泰山學院，2004），頁 269-270。該文引《泰山小

刻曲阜聖廟行教像、鄒邑孟廟聖像，立石岱頂孔子廟。此像便成為臺南孔廟所重刻者之底本。惟此石刻放置處，徐氏並未說明。根據 1940 年日人馬場春吉所編纂之《孔孟聖蹟圖鑑》（參附圖一）云：

泰山の頂に於ける孔子廟の東壁に嵌せられた銅刻の孔子似劍の像である。知泰安縣事徐宗幹の識語に「道光辛巳歲，攝篆闕里，得宋米芾所繪聖像一幅。敬謹重勒于岱頂之殿壁間，以永仰止之思」とある。<sup>37</sup>

同書亦拍攝西壁所嵌銅刻亞聖孟子像，該像為清道光 9 年所置，像之左側有識語云：

始祖亞聖像，為康熙時重摸（摹？）洪武間本最為真。樹師囑繪縮本刻置泰山文廟西壁。時道光己丑春月七十代裔孫廣均謹識。

換言之，在 1940 年以前此二像仍然清楚保留在泰山孔子廟之東西兩壁。惟啟人疑竇的是：徐宗幹自言「立石」，但何以馬場氏所看到的是「銅刻」？是否道光以後，復有改製、重塑？泰山學者周郢於 2007 年〈泰山孔像傳台島〉一文中描述此像之現況：

在泰山之巔的孔子崖上，樹立著一方石刻孔子像，高 96 釐米，寬 42.5 釐米。像為平面線刻，採用傳說中的孔子面相：圩頂、隆鼻、海月駢齒。畫中人物寬衣博帶，腰佩長劍，雙手交合胸前，目光深遠，面容煦煦，藹然可親。而在臺灣，號稱「全臺首學」的臺南孔子廟中，也有一方至聖石像，石高 96 釐米，寬 48 釐米。此石被學者認定是目前臺灣最早的孔子石像，「全台僅見」受到異常珍視。

而在近百年的時代滄桑中，泰、臺這兩尊孔像，又都經歷了一場「失而復得」的奇特命運：泰山孔像直到二十世紀前半葉，一直被供奉於孔子廟壁。上世紀四十年代，日本漢學家馬場春吉曾拍攝此像，收入他的大型畫冊《孔孟聖蹟圖鑒》，因而廣為人知。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於政治原因，孔子廟被

---

史》云：明代查志隆等續成祀事時，廟中「奉至聖銅像及四配像」。後知州秦懋約以非禮撤去。康熙 15 年楊霖、吳雲等人重建時，則「礪石為像」。時任泰安學政孔貞瑄撰文記載，又有趙國麟〈岱頂孔子廟落成志喜〉詩，皆可證明康熙時重塑石像之事。今此像殘石，猶存於岱頂南天門未了軒中。按：查志隆《岱史》明言「設神主」，不聞設像。惟另載「孔子崖銅像僅存，殘毀者半。」故萬曆初成時，殿中未必有像，至於清初重修時於殿中礪石為像，則無足怪矣。蓋當時各地學宮已多有未遵嘉靖廢像之制。

<sup>37</sup>〔日〕馬場春吉：《孔孟聖蹟圖鑑》（東京：山東文化研究會，1940），頁 25。

廢棄，石刻像刻也迷失不存。八十年代殿宇盡復，但此像卻杳如黃鶴。而臺南孔像也頗歷變遷：1945年臺灣光復，孔像由崇聖祠東偏，被移存於大成殿中。1977年拆建大成殿，此像也不知所在。一脈相連的兩尊孔像接連消逝於人們視線，成為世人心中的莫大憾事！

2006年10月，泰山石刻專家姜豐榮先生也意外地在岱頂碧霞祠大殿後，發現一方古石刻像，經仔細辨認，證實其正是迷失數十年之久的清刻孔像。2007年2月10日，泰山景區在孔子廟前舉行了隆重的孔子像碑揭幕儀式，石像又重新供奉於修葺一新的孔子廟中。<sup>38</sup>

周郢這篇報導，屢被泰山觀光單位與相關文史研究者轉引<sup>39</sup>，是目前描述泰山孔子像與徐宗幹關係最主要的文章。周氏委婉提及孔廟在文革時廢棄，此像當時或是被時人有意遺棄，或無心保藏在碧霞祠大殿後，反而倖存。直到2006年發現，2007年重立在孔子廟入門之屏牆上。(參附圖二)筆者實地考察：該廟山門為歇山式屋頂，明間開一券門，兩旁有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可以語上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題款云：「道光壬辰四月望日，知泰安縣事江左徐宗幹敬題。」入山門有一屏牆有簷，中鑲先師孔子行教圖像。兩側有聯：「登泰山而小天下；黜百氏以宗六經。」下款云：「光緒廿八年尹銘授撰聯，丙戌冬月張乃嘉重書上石。」牆背面對正殿，則書一儒字。然該牆恐非舊物，牆上原有孔子圖像一幅，2007年重立徐宗幹所刻

<sup>38</sup> 周郢：〈泰山孔像傳台島〉，原刊於《齊魯晚報》，2007年10月1日；後收入《周郢讀泰山的博客》網站，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e6ba401000dez.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e6ba401000dez.html)（2016年7月18日上網）。

<sup>39</sup> 早於周郢之前，泰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於其官方網頁，以〈泰山孔子結緣又添重要一筆，孔子行教像碑現泰山〉為題發佈此一消息。內容云：「像右下有小字一行，為：『道光辛巳歲，攝篆闕里，得宋米芾所繪聖像一幅。敬謹重勒於岱頂之殿壁間，以永仰止之思云。知泰安縣事，南通州徐宗幹薰沐謹識。』刻字通高29.5厘米，字徑0.5厘米。此碑原在岱頂孔子廟，不知何時匿跡。泰山與孔子的結緣，現又增添了重要一筆。」參泰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泰山孔子結緣又添重要一筆，孔子行教像碑現泰山〉，2007年2月1日，《泰山》網站，網址：<http://www.mount-tai.com.cn/1733.shtml>（2016年7月18日上網）。但可能與周文為同一來源。至於學者的轉引，如李祥磊：〈泰岱孔子聖山聖人〉，《東北之窗》19(2012.10)，頁122-125。李祥磊：〈泰山與孔子〉，《海燕》9(2015.9)，頁121-124。梅慶吉：〈泰山之巔孔子廟〉，2012年8月18日，《梅和勒·慶吉》網站，網址：<http://meiqingji.blog.163.com/blog/static/10610762320127189498523/>（2016年7月18日上網）。王萌、李家駒：〈循吏徐宗幹海峽兩岸傳播儒學考〉，《孔廟國子監論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146-151。王、李二人服務於四川省閬中市文廟，即當年保寧府之所在。文中只描述了閬中文廟之歷史沿革，惟並未就此碑圖之存佚加以探究。

者時，遂被置換。<sup>40</sup>至於保寧府（閬中）學宮者，則因幾經遷址，原碑業已毀棄。<sup>41</sup>

至於臺南者，據徐宗幹言原供奉於崇聖祠東殿。據何培夫〈臺灣碑碣概覽〉的調查陳述<sup>42</sup>：1994年9月清理臺南孔廟庫藏時，發現塵封多年的孔子行教像。石高0.96米，寬0.48米，畫中人物為寬衣博帶，雙手上下相合，佩劍行教式，雕琢精工，碑額刻「至聖先師像」。像側有題跋云：

道光辛巳，仕曲阜時珍藏；甲申，官泰安，敬刊岱頂。後守蜀，復撫立閬中郡學。戊申，奉拓本渡臺，授石生耀祖，敬謹重鐫，與海外人士共瞻仰之。  
江南通州徐宗幹謹記。

後遂被鄭重移置廟內文物陳列室，以供觀瞻。（參附圖三）筆者數度前往考察，此碑保存現況甚佳，線條與題記字跡皆十分清晰。2014年9月28日臺南孔廟舉辦「臺南孔廟文化節」，新增「把孔子帶回家－拓碑DIY」活動時，底本即是徐宗幹所流傳下來的孔子行教像。<sup>43</sup>

## （二）徐氏廣佈孔子圖像的原由

《年譜》記載：道光元年徐宗幹初任曲阜縣事，即恭謁聖廟聖林。22年兗州府任內再恭謁聖廟聖林。固然，天下士人皆以孔子為師。有幸得恭謁聖廟並載於年譜，並不令人意外。而且徐氏入川抵成都，亦記恭謁武侯祠。（《年譜》，頁34-35、64-65、

<sup>40</sup> 參考 2005 年新意文化教育網所載〈孔子、孔廟和泰山〉一文所附圖片，便與今見不同。網址：[http://www.newconcept.com/CultureExchange/china\\_tour/kongzi/kongzi.html](http://www.newconcept.com/CultureExchange/china_tour/kongzi/kongzi.html)（2016年7月18日上網）。

<sup>41</sup> 參考 2014 年〈儒家文化薪火相傳，遠遊「孔子」回歸南充閬中〉報導所言：「山東濟南楊寶生先生，得知徐宗幹也曾在閬中鐫刻孔子像，便於 2014 年 6 月 9 日，慕名專成拜訪了閬中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歷史學者王萌先生，得知閬中因文廟遷址，致多次損毀，孔子像碑早已經不復存在，便表示為了薪火相傳自願為閬中文廟重鐫孔子像。」楊仁昌：〈儒家文化薪火相傳，遠遊「孔子」回歸南充閬中〉，2014 年 9 月 15 日，《四川新聞網》網站，網址：<http://nc.newssc.org/system/20140915/001497905.html>（2016 年 7 月 18 日上網）。

<sup>42</sup> 何培夫：〈臺灣碑碣概覽（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8：2（2002.6），頁 68-86。

<sup>43</sup> 趙家麟：〈台南辦孔廟文化節，以八音讚聖為主題〉，2014 年 9 月 17 日，《中國評論新聞網》網站，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33/8/8/0/103388012.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3388012>（2016 年 7 月 18 日上網）。

68。 ) 入川、出川途經各處訪名人勝跡，亦多留下詩作<sup>44</sup>，這與多數士人皆同。是以，任何在各地尊孔尚儒的地方官吏做這些修繕學宮、興復書院、刊刻書籍，乃至於親自督課等事，皆在情理之中。然就清代臺灣吏員中，文獻上並沒有像徐宗幹一樣致力廣佈孔子圖像的人。因此除了有崇聖的心志外，還需有些特殊的因緣。其一就是徐宗幹歷仕山東聖邑州縣，徐氏以一鄉區之士，初任官即署聖邑曲阜知縣。這並不是所有人都可有的機緣。儘管在任不到一年，知縣又不一定皆能參與聖府各項禮典、修繕。但徐氏自曲阜卸任後，至武城、泰安等縣、高唐、臨清、濟寧、兗州等州府，地區多在春秋魯國附近。因此儒家聖賢相關的史蹟，即便多屬後人附會者，但數量之多確非他省可比。因此徐宗幹編纂方志的過程中，既可訪查到相關碑刻、家譜等文獻，更積極的為先賢立祠，宣揚儒教。據徐宗幹在泰山孔子廟的識語「道光辛巳歲，攝篆闕里，得宋米芾所繪聖像一幅」，更可看出地緣因素的確是徐宗幹引以自豪的履歷，更成為流佈孔像的重要關鍵。

留心碑刻圖像，則是第二個關鍵。從其〈濟州金石志序〉自述「輒與山長許印林、商城楊石卿諸君，譚及金石一事，娓娓不倦。乃不惜重貲購求金石遺文，并捐廉遺拓工於本城內四鄉及金、嘉、魚三縣，學宮、寺觀、深山穹谷。凡有金石刻文，靡不椎搨殆遍。」以及《文編》諸多題跋可證知徐宗幹可稱為官場中的金石學者。比如著名的李斯泰山刻石，宋代尚存數十字，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尚著錄之。明嘉靖年間刻石被毀，僅存二世詔書 29 字，乃移置碧霞祠東廡。清乾隆 5 年碧霞祠毀於火，此石遂失。嘉慶 20 年岱頂整修時重現，僅餘殘石兩塊，存 10 字「臣斯臣去疾昧死請矣臣」，嵌於大觀峰前東嶽廟牆外側之讀碑亭內。道光 12 年讀碑亭倒塌，時任泰安知縣的徐宗幹「索殘石於瓦礫中」，遂移至山下岱廟中保存。宣統年間泰安知縣俞慶瀾在岱廟建亭置放殘石，並徐宗幹、俞慶瀾二人之題跋。<sup>45</sup>徐氏題跋《文編》失收，但猶存〈秦篆十字舊存山頂嶽廟屋圯移至雨花道院〉詩云：

<sup>44</sup> 如〈詩錄〉，卷 8，頁 29 有〈過昌樂望孤山夷齊廟〉；卷 12，頁 4 有〈蘇子卿墓〉（蘇武）、〈班孟堅墓〉、〈馬伏波祠〉；頁 4 〈謁龐靖侯墓〉（龐統）4 首；頁 35-37 〈韓文公祠〉、〈汲縣比干墓〉等。

<sup>45</sup> 參張鵬、林宏：〈復建秦泰山刻石始末〉，《泰山鄉鎮企業職工大學學報》2（2000.5），頁 37-41。尹一梅：〈秦《泰山刻石》考辨——兼談刻帖中的秦始皇刻石文字〉，《碑林集刊》12（2006.12），頁 286-298。

一紙輕摹辨是非，先秦殘墨總依稀。山靈也愛留金石，不與懸崖屋瓦飛。（〈詩錄〉，卷 6，頁 22。）

因此在曲阜，除了所得的聖廟行教像外，對於元代黨懷英所書曲阜孔杏壇二字，亦屢傳拓贈送諸生，以為獎勵。除了碑拓，徐氏對於圖畫亦頗加收藏或題跋，如以下數則：

辛丑得劉松年繪聖蹟圖冊，以禱於尼山始，以西狩獲麟終，共二十幅。柯九思題識。度藏易於褻瀆。壬寅春攝兗郡，敬呈伯海上公藏之。

昔日任濟州時，得彩繪聖蹟圖一冊。敬以贈孔上公。余分校所得耳字號，中卷四氏學，皆出余門。戊子孟廣均、辛卯孔憲璜。所得聖賢後裔珍藏之翰墨，不輕以與人。（〈雜錄〉，卷 2，頁 9。）

可看出徐氏在道光年間充鄉試同考官，所取孔顏曾孟四氏聖賢後裔，誼同師生。因此可由此得見聖賢後裔家藏之珍貴翰墨，泰山識語中宋米芾所繪聖像一幅，或亦因此關係得來。再如文中的孟廣均，在泰山題跋中即云徐宗幹囑咐孟廣均將康熙時重摹洪武亞聖孟子像，繪縮本，以刻置泰山文廟西壁。但所得來的劉松年彩繪聖蹟圖冊，則又敬呈孔府伯海上公藏之。孔伯海，即衍聖公孔繁灝，道光 21 年（1841）襲封衍聖公。同治 2 年（1863）卒，諡「端恪」。<sup>46</sup>有了地緣以及與孔孟聖裔的師友關係，使得徐宗幹在蒐羅文獻上，深有助益。

在先秦兩漢的子史典籍中，對於孔子的形貌多只是文字的陳述。現存最早的圖像，主要見於漢代如武氏祠的畫像石上。<sup>47</sup>然而這些畫像刻在祠壁，卻不是用做祭

<sup>46</sup>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483，頁 13310。

<sup>47</sup> 新近考古發現更發表了西漢時期的孔子屏風，其圖像又遠較東漢畫像石為早。楊軍、徐長青：〈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考古》7（2016.7），頁 45-62，言：2011 年所發掘南昌西漢海昏侯墓中，確定墓主為昌邑王劉賀。陳明：〈從海昏侯墓孔子畫像看漢代墓室繪畫〉，《中國美術》4（2016.8），頁 50-53，云：「2015 年底在海昏侯墓葬中出土的文物中，發現了迄今為止最早的孔子畫像。在主槨室的西側，考古人員發現了一組繪有人物形象的類似屏風組件，其中漆器殘片長 0.7 米，寬 0.5 米，背後襯托有銅板。因為損毀較為嚴重，在沒有整理修復的情形下，只能看到一個模糊的下半身，但是，在畫像一側，可以辨析出題字，其中有這樣的隸書文字：『字中尼，姓孔，……魯昭公六年，孔子蓋卅矣，孔子……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等。另外孔子、顏回、叔梁紇等人名以及『野居而生』等字樣也被辨識出來。有專家經過進一步分析認為，這可能不是屏風，而是一件

祀之用；只能用是祠廟中傳達歷史與教化理念的壁畫裝飾。董喜寧以為：孔廟設像而祭約興起於漢代，最初所用為畫像。如桓帝永壽年間魯相韓敕飭修孔子廟，有「改畫聖象如古圖」之語。《水經注》云：「魏黃初二年，文帝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置百石吏卒，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sup>48</sup>（壽光縣）城西南水東有孔子石室，故廟堂也。中有孔子像，弟子問經。既無碑誌，未詳所立。」<sup>48</sup>董喜寧以為則當為塑像。<sup>49</sup>唐開元 27 年封孔子為文宣王，正孔像位為南面，並「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太祖建隆元年視國子監，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徽宗崇寧 4 年加文宣王冕十二旒服九章，並畫圖頒天下州縣學，依圖改正。明代洪武 2 年令天下郡縣皆立學，每學皆有孔廟。15 年作先師孔子廟，去塑像用木主。<sup>50</sup>但此令據嘉靖時張璁所言，只適用於南京太學，北京國子監塑像，仍因前元之舊不忍毀之。嘉靖 9 年大禮議，方令通行天下學校去塑像為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sup>51</sup>此令一下，拘於舊俗，陽奉陰違者，不在少數。如徐氏所修《濟寧直隸州志》即載：

廟中從祀像，始元皇慶元年，明永嘉相張璁題易木主。兩廡賢像盡撤，惟先師像，生員王鑑以死護守。他學宮皆木主，濟甯像獨存。

康熙五十一年升宋儒朱子為先賢列十哲之次。乾隆三年又升祀有子，皆木主。四十二年知州藍應桂補堦二像。兩廡各十六室先賢先儒皆木主。<sup>52</sup>

至明清以來，遵禮制者惟立木主；從舊規者，並依唐宋以來冕服立塑像。誠然，民間祭祀自佛教東來促成「影祭」、「影堂」的流行。宋代民間家禮「影堂」成立，「影」

---

衣鏡。但不論如何，畫像為孔子是無疑的。在這漫漶不清的畫像上，可以依稀辨認出人物身著長袍，拱手而立的樣態。畫像的外輪廓以粗獷的墨筆勾勒，體現出簡略渾厚的風格，這也是秦漢時期繪畫的典型特徵。可以相印證的，是漢代山東嘉祥武氏祠的畫像石《孔子見老子》，在類似的題材中，孔子都是著寬衣大袍，帶儒冠，拱手彎腰作拜謁狀。唯不同的是，海昏侯墓中的孔子像是漆畫。」

<sup>48</sup> 北魏·酈道元著，明·朱謀埠箋：《水經注箋》（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8），卷 25，頁 6；卷 26，頁 8。

<sup>49</sup> 董喜寧：〈孔廟孔像考〉，《孔子研究》4（2011.7），頁 103-112。

<sup>50</sup> 明·李之藻：《類宮禮樂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40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頁 22-46。

<sup>51</sup> 明·朱厚燾：《嘉靖祀典考》，卷 5，頁 27 之 2-28 之 2。

<sup>52</sup> 清·徐宗幹等：《（道光）濟寧直隸州志》，卷 5 之 1，頁 1。

在家祭活動中佔有愈來愈重要的地位，明清祖先畫尤盛極一時。<sup>53</sup>但是中央禮典在存古與尊朱的影響下<sup>54</sup>，是否廢像、立像？頗多掙扎，惟各地孔廟終未出現以畫像做為祭祀對象的情形。是以，徐宗幹得此孔子圖像，但立於東西兩壁，或崇聖祠東偏殿、或拓印分送而已。闕里所藏孔子圖像，幾經流離戰亂。據曲阜文物單位統計，孔廟今但存 13 幅（其中又有 2 幅上調為山東省博物館）。主要有傳為顧愷之繪《二聖圖》、吳道子繪《行教像》、《司寇像》<sup>55</sup>，此外就是明清兩代大量出現的《孔子聖跡圖》，但並沒所謂「米芾所繪聖像」。惟曲阜孔廟聖跡殿內西側北起第二石，石右上有由米芾手書：「大哉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之前，絕無孔子。孔子之後，更無孔子。大哉孔子，大哉孔子」之題贊。此與傳世所稱吳道子之孔子行教圖佈局類似，但顯是二圖。徐宗幹所得，蓋指此而言。只是泰山的識語云米芾所「繪」，則恐是誤題。

徐宗幹所以熱衷刊行孔子圖像，除了上述因素外，更與他重視課士，崇尚教化的施政宗旨有關。為使諸生感受到承繼學脈使命，再也沒有比淵源自聖邑的圖像、文字，更為深刻的獎勵。尤其相對江浙，保寧、臺灣兩地相距曲阜有千里之遙。今日徐宗幹因曾仕魯省，並與孔孟聖裔素有往來，故能為兩地學子帶來此神聖信物。這便無怪海東院生石耀祖之懇請，以及恭請石像入學的莊嚴隆重。站在徐宗幹的角度，既要鼓勵士人務習舉業，以安定民心；又要以儒理取代清中葉以後層出不窮的民間教派亂事。崇儒興學是治理海外疲繁之地最根本的治道。再則，除了泰山孔子廟之外，在四川與臺灣這方，孔子行教像石碑的實質用途，不單是立於學宮以為瞻仰而已，理應還有做為傳拓的印刷底本功能。尤其當流傳在民間的宗教已大量運用圖像、文字傳達教派信仰時，徐宗幹所積極刊行分送的孝弟圖、闡範圖，如果可比擬做一種政治勸化的宣傳海報；則孔子行教圖像，對於士子而言，不亦與佛道肖像一般，敬奉在書室，崇仰攝心。雖然徐氏不見得將儒學當做宗教來看待，但相較

<sup>53</sup> 彭美玲：〈「立主」與「懸影」——中國傳統家祭祀先象神樣式之源流抉探〉，《臺大中文學報》51（2015.12），頁 41-98。

<sup>54</sup> 明代丘濬禮議中便引朱熹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耳。」藉此論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

<sup>55</sup> 孔德平：《孔子像、衍聖公及夫人像》（北京：現代出版社，2007），〈前言〉。

於他所排斥的不務生產的佛道而言，以儒代之，無論是廟產，或是思想，都是兩全其美的上策。

#### 四、結語

每一間孔廟所關連的歷史與人物，皆會對該廟的發展產生出不同程度的影響。吾人透過尋繹徐宗幹《自訂年譜》、《文編》等第一手著作，並鉤沈方志中與徐氏相關的二手材料，相互參證，可以更清晰了解徐宗幹在文教上的貢獻，而不至於被其軍功、政績所掩蓋。進一步研析，更可看出其施政理民的態度與手腕。

筆者開始研究孔廟之初，前輩曾提點：若干游宦臺灣的人士，是否會將其家鄉或前任的建築裝飾風格、禮樂形制，流傳到臺灣？以徐宗幹而言，無論是曲阜孔廟、泰山孔子廟，或是臺南孔廟。即便徐氏已身居知州、知府或道台，都不是最主要的修繕者。因此數處孔廟建築，並沒有徐氏的直接文獻可供研究其影響。<sup>56</sup>然而，從有形的文物，乃至於無形的教育敦化。徐宗幹的確藉由曲阜的文物傳佈，繫聯起各地的孔廟、書院乃至於士風。尤其徐氏偶然傳入的米芾所題孔子行教像，在歷史上應屬臺灣第一幅刊刻在學宮的官方孔子圖像。雖然，今日臺灣所行的孔子圖甚或是塑像正如多數地區一般，乃以據傳出於吳道子的行教像為主。但因二圖在風格上大體相近，較不似另一魯司寇像般，強調「七陋」的異相。加上臺地孔廟奉祀時多本嘉靖以來的禮制，立主而不塑像。<sup>57</sup>所以臺灣至今對於孔子形象的認知，從未引起太多的波瀾。徐氏的偶然，卻不經意影響了現今兩岸孔子形象的定義。因此，現今孔廟研究如能結合實地考察與文獻考古，綜覽建築、禮典、儒學、文物、歷史以及人事，便能找出最有意義，且深富時代價值的新課題。筆者順道考察的泰山孔廟尚

<sup>56</sup> 如〈奏疏〉，卷 1，頁 14，上報道光 28 年彰化嘉義地震，學宮祠廟倒塌之賑災、籌款修復情形。〈藝文〉，卷 4，頁 14，〈高南卿司馬行狀〉提及彰化縣同知高鴻飛在地震後有興復之勞。但嚴格來說，徐宗幹對於今之彰化孔廟的發展並沒有直接參與。

<sup>57</sup> 臺灣的孔子塑像多半是光復後，甚至是推行中華復興運動時所立的銅像。作用與政治人物的銅像相仿，安在廣庭之中以供景仰；並非安在神座上供人祭祀。

且如此，何況深入一一考察各地學宮今古變遷及其文史紀錄呢？此不只是筆者之志，更盼望同道者齊心為之。

附圖



附圖一 馬場春吉《孔孟聖蹟圖鑑》1940年所錄泰山孔子廟孔子行教像



附圖二 筆者 2016 年考察所攝泰山孔子廟孔子行教像



附圖三 筆者 2015 年考察所攝臺南孔廟孔子行教像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北魏·酈道元著，明·朱謀埠箋：《水經注箋》，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8。
- 唐·韓愈著，宋·朱熹校：《朱文公校昌黎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宋·趙汝愚編：《宋名臣奏議》，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19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申時行等：《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
- \* 明·朱厚燧：《嘉靖祀典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網站，網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2016年10月5日上網）。
- \* 明·李之藻：《頰宮禮樂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40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查志隆：《岱史》，合肥：黃山書社，2008。
- \* 清·丁曰健：《治臺必告錄》，清同治丁卯知足知止園刊本，1867。
- 清·周家齊等：《（光緒）高唐州志》，收入《中國方志庫》初集，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0。
- 清·周璽等：《彰化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庫》初集，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0。
- 清·唐仲冕編，嚴承飛點校：《岱覽點校》，泰安：泰山學院，2004。
- \*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9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 清·徐宗幹等：《（道光）濟寧直隸州志》，收入《中國方志庫》初集，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0。
- \* 清·徐宗幹編：《斯未信齋主人自訂年譜》，收入郭秋顯、賴麗娟主編：《清代宦臺文人文獻選編》，新北：龍文出版社，2012。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臺北：里仁書局，1987。

施士洁：《後蘇龔合集》，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文獻叢刊》第 21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

不著撰人，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 二、近人論著

孔德平：《孔子像、衍聖公及夫人像》，北京：現代出版社，2007。

尹一梅：〈秦《泰山刻石》考辨——兼談刻帖中的秦始皇刻石文字〉，《碑林集刊》12（2006.12），頁 286-298。

方旭峰：《明清之際浙江禪宗寺院地理分布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08。

王萌、李家駒：〈循吏徐宗幹海峽兩岸傳播儒學考〉，《孔廟國子監論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 146-151。

何培夫：〈臺灣碑碣概覽（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8：2（2002.6），頁 68-86。

李祥磊：〈泰岱孔子聖山聖人〉，《東北之窗》19（2012.10），頁 122-125。

李祥磊：〈泰山與孔子〉，《海燕》9（2015.9），頁 121-124。

\* 李毓嵐：《徐宗幹在臺施政之研究（1848-1854）》，桃園：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7。

\* 周郢：〈泰山孔像傳台島〉，原刊於《齊魯晚報》，2007 年 10 月 1 日；後收入《周郢讀泰山的博客》網站，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e6ba401000dez.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e6ba401000dez.html)（2016 年 7 月 18 日上網）。

林雪娟：〈府城山東孔子像系出同門〉、〈兩岸三孔子像緣來是一家〉，《中華日報·臺南產消版》，2014 年 8 月 21 日；〈楊寶生盼牽線台孔廟訪山東孔廟〉，《中華日報·臺南產消版》，2014 年 8 月 22 日；〈山東旅人楊寶生 12 天訪 25 孔廟〉，《中華日報·臺南產消版》，2014 年 9 月 2 日。

- 林開登編：《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三四週年誕辰釋奠暨以成書院一五〇週年特刊》，臺南：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1984。
- 泰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泰山孔子結緣又添重要一筆，孔子行教像碑現泰山〉，2007年2月1日，《泰山》網站，網址：<http://www.mount-tai.com.cn/1733.shtml>（2016年7月18日上網）。
- 張鵬、林宏：〈復建秦泰山刻石始末〉，《泰山鄉鎮企業職工大學學報》2（2000.5），頁37-41。
- 梅慶吉：〈泰山之巔孔子廟〉，2012年8月18日，《梅和勒·慶吉》網站，網址：<http://meiqingji.blog.163.com/blog/static/10610762320127189498523/>（2016年7月18日上網）。
- 連橫：《臺灣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 陳明：〈從海昏侯墓孔子畫像看漢代墓室繪畫〉，《中國美術》4（2016.8），頁50-53。
- 彭美玲：〈「立主」與「懸影」——中國傳統家祭祀先象神樣式之源流抉探〉，《臺大中文學報》51（2015.12），頁41-98。
- 新意文化教育網：〈孔子、孔廟和泰山〉，2005，《新意文化教育網》網站，網址：[http://www.newconcept.com/CultureExchange/china\\_tour/kongzi/kongzi.html](http://www.newconcept.com/CultureExchange/china_tour/kongzi/kongzi.html)（2016年7月18日上網）。
- 楊仁昌：〈儒家文化薪火相傳，遠遊「孔子」回歸南充閬中〉，2014年9月15日，《四川新聞網》網站，網址：<http://nc.newssc.org/system/20140915/001497905.html>（2016年7月18日上網）。
- \* 楊永智：《明清臺南刻書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 楊軍、徐長青：〈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考古》7（2016.7），頁45-62。
- 董喜寧：〈孔廟孔像考〉，《孔子研究》4（2011.7），頁103-112。
- 趙家麟：〈台南辦孔廟文化節，以八音讚聖為主題〉，2014年9月17日，《中國評論新聞網》網站，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33/8/8/0/103388012.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3388012>（2016年7月18日上網）。
- \*〔日〕馬場春吉：《孔孟聖蹟圖鑑》，東京：山東文化研究會，1940。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Qing] Ding Yue-Jian, *Zhi Tai Bi Gao Lu* [Important Literature on Governance of Taiwan], (1867).
- Harukichi Baba, *Kong Meng Sheng Ji Tu Jian* [The Illustrated about the Historical Site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Tokyo: Santo Bunka Kenkyukai, 1940).
- Li Yu-Lan, *Xu Zong-Gan Zai Tai Shi Zheng Zhi Yan Jiu* [Shiu Tzung-Gan in Taiwan (1848-1854)], (Zhongli: Master Thesi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97).
- [Ming] Li Zhi-Zao, *Pan Gong Li Le Shu*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ituals and Music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adopted 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 Yuan Ge Edition)] No.409,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
- [Qing] Xu Zong-Gan, *Si Wei Xin Zhai Wen Bian* [The Collections of Si Wei Xin Zhai] adopted in *Qing Dai Shi Wen Hui Bian* [Qing Dynasty Poems Compilation] No.593,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Work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Qing] Xu Zong-Gan, *Ji Ning Zhi Li Zhou Zhi* [The Chorography of Ji Ning] adopted in *Zhong Guo Fang Zhi Ku* [Chorography of China], (Beijing: Erudition Digital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2010).
- [Qing] Xu Zong-Gan, *Si Wei Xin Zhai Zhu Ren Zi Ding Nian Pu* [The Yearbook of the Master of Si Wei Xin Zhai] adopted in Guo Qiu-Xian & Lai Li-Juan, *Qing Dai Huan Tai Wen Ren Wen Xian Xuan Bian* [Scholar Document from Expatriate Officer in Taiwan for the Qing Dynasty], (New Taipei: Long Wen Press, 2012).
- Yang Yong-Zhi, *Ming Qing Tai Nan Ke Shu Yan Jiu* [A Study o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of Tain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aizhong: Master Thesis, Tung Ha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2).
- [Ming] Zhu Hou-Cong, *Jia Jing Si Dian Kao* [Ritual Ceremonies in the Jiajing Period],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2005).
- Zhou Ying, *Tai Shan Kong Xiang Chuan Tai Dao* [The Confucius Image From Taishan to Taiwan] in *Qi Lu Wan Bao* [Qilu Evening News], (1 Oct. 2007).

